

## 翻譯與帝國官僚：英國漢學教授佐麻須 (James Summers; 1828—91) 與十九世紀東亞（中日）知識的生產\*

關詩珮

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  
ugandakwan@ntu.edu.sg

### 摘要

東亞知識是如何在十九世紀時的大英帝國產生的呢？這看似是一個極廣泛的議題而難以入手。然而，只要我們從政經帶動文化嬗變的角度思考，並以實際外交事件作為歷史線索，旋即得出比較確實的歷史圖像。鴉片戰爭後英國利用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在華獲得龐大利益，不單擾亂了東亞的政治秩序，瓦解了過去以中國為首的漢字圈文化權力，更驚醒了列強，急趕加入瓜分中國及周邊東亞地區的需要，以此制衡英國在遠東的勢力。為了箝制法國於安南（越南）日益擴張的勢力，並遏止美國於江戶開港後的利益，英國先後於這些東亞國家簽訂不同的條約，逐步派遣譯員及領事駐守這些地區，處理外交及商務工作。

然而，英國在過去並無累積深厚東亞知識，十九世紀中葉才剛剛步履蹣跚地建立漢學講席，目的就是要成立譯員課程，協處理中英外交實務，那麼，在同一時間又如何突然應付日益繁重的東亞情報及外交工作，特別是處理東亞發揮著極大影響力的日本呢？

本文以多項學界首次出土的原始歷史文獻（包括外交部檔案（Foreign Office records）、大英博物館檔案（British museum archive）、牛津大學檔案（Oxford University archive）及國王學院校史檔（King's College University archive）、倫敦印度辦公室圖書館檔案（India Office Library archive）等，倫敦印度辦公室圖書館檔案（India Office Library archive）、英國的傳道會檔案（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等等，旨在發掘英國倫敦大學國王學院第二任漢學教授佐麻須（James Summers; 1828—91）的事蹟，並以他的生平作為經緯，反映大英帝國在功利目的主宰下，如何利用學府培養外交譯員，建構出譯員晉升帝國官僚的機制，並同時展現漢學教授熱心參與其中，競逐爭相成為帝國官員的過程。本文以佐麻須作為案例，展現英國如何在急需大量東亞譯員過程中，產生錯誤東亞知識，然後又因為大英帝國本身政界、文化界、出版界等多種雄厚權力協力交織下，逐步矯正誤識，在英國漸漸建構出富有學術意義的東亞研究。

**關鍵詞：**佐麻須（James Summers）、英國漢學、外交部譯員課程（中國及日本）、倫敦國王學院、《中國（暨日本）叢報》、威妥瑪（Sir Thomas Francis Wade）

---

\*感謝楊承淑教授的邀稿，讓我借此機會整理這篇積存經年的論題。雖然相關文獻是多年前已從香港、英國及日本盡力搜尋，但由於資料浩繁、來源不一，落筆之際仍發現略欠部分文獻，後得到南洋理工大學圖書館流通及資訊諮詢部館員林俊豪（Edward Lim）的協助，於農曆年間仍不斷向英日兩地確定文獻傳送無誤，特此致謝。

## Translation and Imperial Bureaucrat: The British Sinologist James Summers and the Knowledge Production of East Asia

Kwan Uganda Sze-pui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 Abstract

How did knowledge about the East Asia come into being in the 19<sup>th</sup> century? The topic seems too broad to be tractable, unless we realize that cultural production about East Asian was tightly connected with the contact and conflict between 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East Asia countries. Ever since China had been defeated by the British in the opium War, the power structure in East Asia was severely upset. Formerly, China was the powerhouse of East Asia. Its defeat by the British alarmed other Western countries so that France and the US immediately tightened their military and diplomatic grip of Edo and Annam respectively. To protect their commercial interest and to keep watch of other western players in the East Asia, the British tried to extend the Chinese student interpreter training program and include other East Asian languages, such as Japanese, Vietnamese, Siamese and Korean. The plan was idealistic and ambitious, but did the British have the intellectual and material resources to execute such plan?

The paper will discuss in details the production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knowledge in Victorian Britain. Our discussion will be focused on James Summers, the second Chinese professor at King's College London, who used various academic institutions, including the British Museum and the Indian Office Library, as platform to produce knowledge about East Asia and disseminate it through print media. In order to understand how knowledge about East Asia was produced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we shall also discuss James Summers' interaction and competition with other sinologists at the time, such as Thomas Francis Wade, who also aimed to an be imperial interpreter and the leader of the program. The paper will use an extensive original archival material extracted from the archives Foreign Office, British museum, Oxford University,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to aid the discussion.

**Key words:** James Summers, British Sinology, Student Interpreter programme (China, Japan) of Foreign Office, King's College London,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Repository*, Sir Thomas Francis Wade

## 壹、引言

十九世紀中葉起，英國挾著科技現代化的威力，在 1839-42 鴉片戰爭一役，驚醒了沉睡多年的中國。在近代中國史裡，這是中國現代化的開始。不過，正如我們所知道的，這其實也是東亞諸國現代化的開始。鴉片戰爭驚醒了沉睡多年的中國之外，同時驚醒了中國周邊地方（如日本、暹羅、韓國、越南等）繼續景仰天朝中國的必要性，這些過去對中國奉行朝貢禮儀的蕃屬國，漸漸重新評估在外交上與中國的臣屬關係(Kang 2010; Cox, Dunne & Booth 2001; 濱下 1997; Womack 2006)。在語言文字上，各地開始逐步捨棄漢語圈共同體的認同感，在一些急於改革的國家（特別是日本），開始產生「廢漢字」鼓吹「洋字」及「羅馬字」運動(溝口 1992; 村田 & ラマール 2005; 平勢 2007)。在思想文化上，更出現批判儒教而萌生激進的「脫亞入歐」論(丸山 2001)。十九世紀在西方殖民主義者覬覦東亞的情況下，東亞政治秩序發生翻天覆地的巨變。各國謀求民族國家的力量抗衡西力的同時，逐漸走上現代化及發展主義的不歸路(Apter 1987)。

過去討論到亞洲現代化的議題時，往往單向式地關注西方如何宰制亞洲，帝國如何利用種種手段（知識作為權力工具、技術武器、經濟體系、文化侵略等）攫奪殖民地。這固然是指經典的後殖民理論（如東方主義），以及修正東方主義而又順著「權力／知識」邏輯發展出來，有關帝國權力如何產生殖民地知識(colonial knowledge)的討論(Breckenridge & van der Veer 1993; Cohn 1996)。但是，殖民地知識如何影響著「帝國」、殖民地知識能否宰制宗主國、殖民地知識在帝國是如何生產等議題，似乎還沒有被充份研究(Cooper & Stoler 1997)。如果以這研究框架思考及批判大英帝國在十九世紀產生東亞知識，似乎能帶出多種啟示。在深入研究十九世紀英國侵略中國及東亞的過程中，我們會發現，大英帝國背後其實並沒有什麼東方知識作為後盾，支撐自己的侵略版圖。從以下一系列的事件中，如果說英國連最基本的東方知識也闕如，亦絕不過份：英國在發動鴉片戰爭之前，對東亞的盟主——中國——認識不深。戰爭時，連中國最基本的地圖、地名、日期以及數量計算值得都沒有弄清楚。戰時又出現譯員嚴重不足的情形(Kwan 2013: 389-417)，行軍情報錯亂不堪。戰爭後與中國簽訂和議時，《南京條約》譯文出現中英語版本不符的翻譯醜聞，需由自己的宿敵法國首先揭露，才急於加強英國本土譯員培訓及情報工作(關詩珮 2013: 128-164)。這反映英國過去沒有精密部署，發動戰爭只為著解決貿易糾紛及實際利益，也在在顯示了帝國力量的空洞及不足。不過，譯戰如何敗陣也好，成者為王。英國利用不平等條款《南京條約》在華獲得龐大利益，不單擾亂了過去東亞的政治秩序，顛覆了東亞各國的權力關係，更驚醒了西方列強，各國開始加入瓜分中國及周邊東亞地區的競賽，以制衡英國在遠東的勢力。英國要維護自身在東亞的利益，就需要有足夠的譯員擔當翻譯及情報工作。

然而，英國在鴉片戰爭後才剛剛蹣跚地建立中文課程，著手培訓到華譯者，加強情報工作及對華外交事務及殖民地管治等的工作(關詩珮 2011: 123-154)，她又如何能同一時間分薄資源，增設培訓東亞各國譯員呢？就在這時，大英帝國吊詭地發現了漢語的周邊價值，一種非常巧妙的附加功能。原來掌握漢語，除了能攫取漢語

帶來的直接利益（包括交際能力、獲取情報，滿足外交上的諸種需要）外，掌握漢語原來還同時能帶來一種額外優勢，就是以漢語作為進入東亞文化體系的踏腳石。英國在籌辦中國譯員課程的時候，驟然發現，原來漢語及背後承載的漢文化，過去曾經占著東亞地區的文化宗主國的地位，是日本、高麗國、暹羅、安南等地統治階層及國家文獻欽定的官方語言、是經濟體系依仗運作的公共語，是知識分子及菁英階段反映文化優越感的上層語言。漢語既然是東亞各政治體系的核心文化價值，英國只要通過掌握漢語及漢文化圈占著穩妥位置，並利用背後軍事武力作後盾，她便能迅速滲透入東亞。雖然西方史學界一直忽視這點，然而我們只要以幾個極生動的歷史事實，即可既生動及深入地說明。

1847年3月，英方欲箝制法國在安南日益擴張的勢力，急於派遣當時在香港擔任第二任總督的德庇時（John Francis Davis；1795-1890；港督任期 1844-48）到安南簽得貿易條約，欲此保障英國利益。德庇時當時身兼英國駐華全權公使及英國駐華商務總監，職責範圍包括代表英國拓展駐華商務或外交的事務，他本人為知名漢學家。德庇時從香港出發到安南，隨行團員中德庇時從香港出發到安南，帶同略懂越南語的譯員郭實獵（Karl Gützlaff；1803-1851）出發。從現存文獻可見，郭實獵越南語程度應該不高，可以想像，整個團隊在語言不通的情形下，英越語翻譯，難免感到忐忑不安，困擾非常。然而，德庇時到達安南後，卻發現可以利用漢語與越南官員溝通，不單能打破彼此溝通障礙，而且可以說是如漁得水，談笑甚歡。德庇時回英後，不單公開演講學習漢語的好處，更闡發了非常具體生動的演講，指漢字的根，是為亞洲文化的根的看法，鼓勵更多人學習漢語（Davis 1865: 90; Summers 1864: 27）。

英法暗自在中國南海較量後，一直在大太平洋對岸隔岸觀戰的美國亦加入瓜分中國的戰場。1853年美國海軍佩里（Commodore Matthew Perry；1794-1858）駕著其戰艦「黑船」，壓境江戶，要求開港貿易，迫使日本終止鎖國。英國對於美國駛進江戶港（東京灣）直接威脅自己在東亞的利益，自然高度警備。因此，在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1856-60）時，乘著利用大量軍事勢力結集東亞之際，強迫日本與英國簽訂 1858 年「日英修好通商條約」(The Anglo-Japanese Treaty of Amity and Commerce)，並開始派遣領事進駐日本。當時，英國對日本的認識還處於極度膚淺的階段。曾任福州領事（1844 年）及上海領事阿禮國（Sir Rutherford Alcock；1809-1897 年；任期 1846 -1854 年），在日英簽訂「日英修好通商條約」後前往日本出任首位駐日領事（任期 1858 年—1864）。我們都知道，阿禮國是英語世界研究日本的先驅，在日本研究上有重大歷史意義（Cotazzi 2004: 9-20; 33-38; 佐野 2003; 庭野 2008: 67-80），<sup>2</sup>然而，他初識日本的因緣，卻來自一個「誤識」。這個文化誤識就是，阿禮國在中國機緣巧合下拾得一枚日本錢幣，翻到背面，赫然發現日本銅板刻有漢字（Davis 1865: 90），由此而得以窺見中日文化一衣帶水的連帶關係。

英國與越南及日本作初步文化接觸後，「明白」到能以漢語作為跳板，利用漢語在東亞知識版圖的位置，擴散式地深入了解東亞文化，拓展大英帝國的殖民事業。固然，這是一種「誤識」；不過，這種「誤識」卻影響著東亞知識在帝國本土內的產生。

<sup>2</sup>阿禮國對日本研究有重大開創意義，無論是英語學習還是英日兩國文化交流上，學界都有不少研究，見（Cotazzi 2004: 9-20; 33-38）；（佐野 2003）；（庭野 2008: 67-80）等等。

其中一點最大的錯誤，就是下文會深入討論到的，早期派到日本的譯員都先被派到北京學習日本文化的「根」——漢字。幾經波折，才了解原來中日兩國語言文化是截然不同的。<sup>3</sup>

本文希望以倫敦大學國王學院第二任中文教授（亦是全英國第三任中文教授）James Summers (1828—91) 的一生，作一貼切的案例，展現帝國急於膨脹的過程中，因大量需要東亞譯員，突然產生錯誤的東亞知識，然後在派出大量譯員的情形下，因為翻譯工作的性質而得以逐漸修正錯誤。不過，這種帝國知識、誤識、甚至可以說是集體無意識，卻並非由佐麻須發掘，更非憑他一己之力能足以扭轉，而是通過帝國同時培養出來的大量官僚的合作及互相競爭而來。

英國在外交事務上突然需要大量東亞語言能力（特別是中日語）及相關知識的譯員，造就了國家官僚體系上突然膨脹的空缺。由於英國外交部譯員，是外交部文官梯隊的明日之星，日後成為專責處理各種外交事務及管治殖民地的帝國官僚，因此，社會上一群原本擁有良好語文能力或天分的人，或一群對外交事務有野心的人物，就更希望以此迎合帝國發展及海外擴張的機會，以此一展抱負，扶搖直上。帝國主義的理論的其中一個側重點，就是關注帝國官僚在帝國權力的功能及作用。其中又特別關心，帝國官僚的個人利益、權勢追求、政治抱負、官僚取向等，如何影響著帝國的發展。事實上，帝國官僚是落實整個政治架構的關鍵人物，他們用心經營自己的事業，爭取個人成功，為自己贏得更多權勢和利益，與唯命是從地實現帝國意志並沒有相違背，而且可以說，他們為了出人頭地所形成的巨大動力，彼此互相競爭帶來的進步，就更是帝國蓬勃發展不可忽略的重要元素 (Eisenstadt 1963: 273-296)。

James Summers 就是在這個環境中，希望能擠身帝國機器成為一名要員。他雖為漢學教授，卻並沒為自己起任何漢學姓名，但由於他在渡日之前在倫敦生活的時期，已以漢字「佐麻須」作為日語音譯符號標示自己姓氏 Summers，本文以此作為他的漢字名稱。<sup>4</sup> 見圖 1 下方署名

---

<sup>3</sup>詳見下文第 6 節。

<sup>4</sup>他在 1873 年倫敦創辦了首份海外出版的日本報刊《大西新聞》，內以日本漢字自署為「倫頓大學校之教師佐麻須」。佐麻須，即 Summers 或サマーズ漢字音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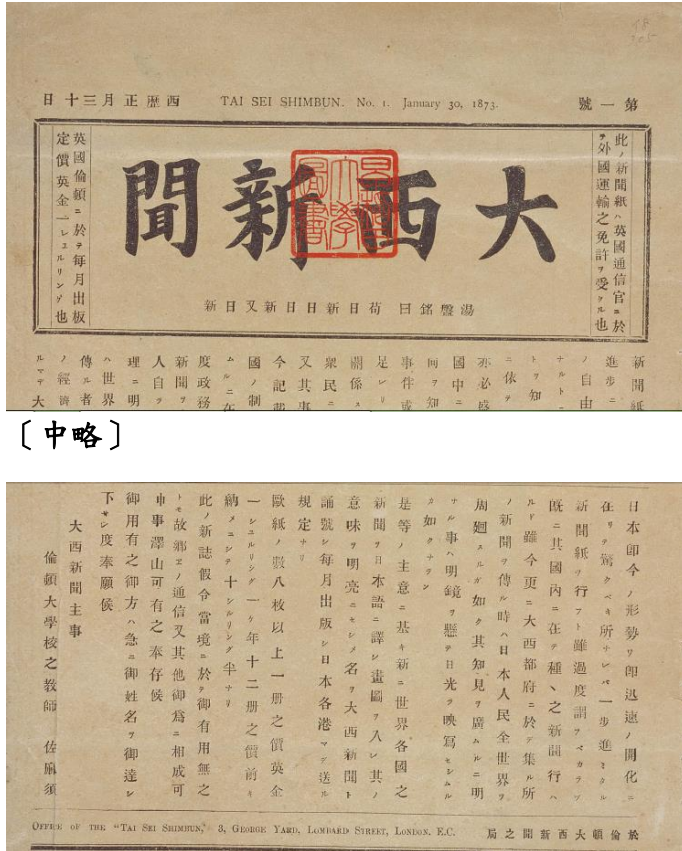


圖 1 鳴謝：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sup>5</sup>

他的一生，見證著英國侵略東亞歷史最重要的一頁，當中包括：中國開門、日本開國、以及幾個最重要東亞城市（如香港、上海、橫濱）「開港」、「開埠」的「現代化」過程。他在中國開門後旋即就在香港及上海生活，後來在英國曾招待日本訪英國岩倉使團（1871-73 年）使節，機緣巧合下受使團邀請到開成學校（東京帝國大學或東京大學的前身）教授英語，在日本寓居二十多年，直至逝世。由於掌握漢語、日語、英語能力，他成為時代炙手可熱的人物，他在東亞擁有豐富在地生活經驗，亦增加了他的文化資本，這種資本令他遊走十九世紀中、日、英三國，因外交平臺而建立出來的東亞現代化的歷史語境，他實在體現了「語言就是權力」的證言。除此之外，在他的履歷中，一直有知名學府作為他事業的後盾，讓他能在優渥的學術平臺兼收並蓄及傳播東亞知識。他先於香港聖保羅書院（St. Paul's College）工作（1848-50）、後獲得英國漢學家斯當東（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1781-1859）聘請，成為倫敦國王學院第二任中文教授，後來於從 1850 年間到 70 年間，在英國其他最頂尖的學術機構任職，這包括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倫敦印度辦公室圖書館（India Office Library），加上他本身又是牛津大學的成員。這樣看來，他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他的學生中，在英國有後來成為他接班人的道格拉斯（Sir Robert Kennaway Douglas; 1838-1913）及曼徹斯特大學首任漢學教授莊延齡

<sup>5</sup> <http://wine.wul.waseda.ac.jp/search~S12?/t{213925}{215824}{214265}{215271}/t{213925}{215824}{214265}{215271}/1%2C1%2C2%2CB/frameset&FF=t{213925}{215824}{214265}{215271}+{214f73}1{21564a}&2%2C%2C2>。

(Edward Harper Parker ; 1849-1926)。而在日本學 (Japanology) 研究方面，則有著名學者暨外交官薩道義 (Sir Ernest Mason Satow; 1843-1929)。在日本，由於他曾任教多所學校，並自己經營英語學校 (手塚 1968: 174-193)，門人之眾多就更不能盡錄，其中最鼎鼎大名的，恐怕是文學界享負盛名的谷崎潤一郎 (1886-1965) (谷崎 1966-1970: 231-240)。佐麻須如此的輝煌的履歷，多樣化的貢獻，在當時而言，即使不算是鳳毛麟角，也是極難能可貴的。

不過，這樣的一位人物，一生念茲在茲的志願，就是矢志加入外交部當外交官。以他非常平凡或略為庶民的出身背景，在當時歷史環境而言，由於國家急需大量譯員，在帝國官僚體系更新的時期 (Hart 1972: 63-81)，加入外交部當譯員似乎是他唯一依恃的敲門磚。不過，諷刺地，他卻無緣成為譯員，卻成為了外交部譯員課程的教師。不過，他卻從無放棄加入外交部的願望。在倫敦大學執教中文課程的二十年間 (1853-1873 年)，做了多種配合外交部工作，以此表明心志，並與後來漢學界夙負盛名的威妥瑪 (Sir Thomas Francis Wade ; 1818-1895) 互相較量，兩人費盡心思，各自以自己的漢學知識，爭取掌管外交部在華學生譯員課程。可惜的是，佐麻須的漢語能力無法為他在外交部取得重要席位，於是他乘著英國擴充日本勢力的契機，自學日語，並以日本知識及熱忱，蕪路藍縷創辦了數份領導日本研究潮流的學術刊物，以倫敦作為基地印刷首份海外出版的日本新聞《大西新聞》(或《泰西新聞》)，並結合自己中日語言知識及文化的優勢，編輯《中國(暨日本)叢報》(*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Repository*)，出版亞洲資訊雜誌《鳳凰》(*The Phoenix*)，以此影響英國外交部的高級官員，特別是阿禮國，讓他們掌握更全面的東亞資訊，設定國策。

能在倫敦以中日語專家雙重身份出現的人，在當時而言是不可多得之人才。他既活躍於學界，又利用倫敦十九世紀出版盛世來宣傳東亞知識的人，更是難得。可惜，學界對他的研究，並不算深入。在現今以中英語出版世界的漢學研究中，對他的研究只停留在皮毛階段 (Twitchett 1862:6-7)。<sup>6</sup>而現有的研究中，亦只能泛泛而論他是一位時代悲劇人物或有趣歷史人物云云。雖然日本學界對他有不少討論，承認他在日本文學西譯及英國文學東傳的貢獻，特別是為他冠以「莎士比亞研究先驅」的美譽 (佐々木 1975: 73-102; 蛭原 1936:43-48; 手塚 1968:174-93; 重久:1932:8-14; Koyama 1997:25-37)，可惜這全都是集中討論他在渡日後的工作，即是 1873 年後的事蹟。<sup>7</sup>本文的研究目的，首先在於對佐麻須在中英兩國事蹟作歷史鉤沉 (重久 1932: 8-14)，在這之後，以他作為大英帝國產生東亞知識的主軸，剖析這樣擁有不凡經歷及豐富成就的人，如何在帝國急需東亞譯員的真空期，經營他的事業，反映

<sup>6</sup>杜希德 (Dennis Twitchett) 在倫敦亞非大學於 1961 年 11 月 28 日的就職演講，說到佐麻須的部分極具參考價值，但由於他的重點在唐史的部分，漢學成立種種討論，他只能匆匆帶過。見 (Twitchett 1862, 6-7)。中國學界方面，研究英國漢學中提到佐麻須的部分就更乏善可陳，而且資料舛錯極多，在此不個別指出。這情形主要歸咎於佐麻須從來沒有留下任何私人信件、書信及日記，見下文深入討論。

<sup>7</sup>唯一例外的是中川かず子的論文，文內採用倫敦國王學院校檔史，重新了解整佐麻須為何渡日任教。見中川かず子 (2008. 41: 95-122)。可惜的是，中川的論文只依據倫敦國王學院的會議記錄 (council minutes)，而並沒有參考外交部及其他英國檔案的資料。中川かず子的論文由日本東京大學藤井省三教授賜示，在此深表謝忱。

翻譯工作在社會上的地位及價值，並將進一步探討譯者工作性質，如何影響東亞知識生產及衝擊帝國權力版圖。

## 貳、早年香港足跡

佐麻須的生平事跡極度曲折。我們先基本了解他的基本生平，以及他遠渡東亞的第一站——香港的生活足跡，整合了他的早期際遇後，再放回大英帝國脈絡中去考察。這樣做有重要的意義，首要原因在於學界一直缺乏這部分資料，而無法作深入討論外，更重要的原因是，香港是他不凡際遇的序幕，亦為他的命運帶來覆滅性災難的淵藪。

佐麻須的生平，學界現僅存幾項可靠研究資料，當中包括《牛津國家人物事典》(*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簡介 (Matthew, Harrison & Goldman 2004: 318-319)<sup>8</sup>、日本出版《近代文學研究叢書》部分通過訪問佐麻須家族後人 Lily Summers 而來的資料 (Summers 1951; 昭和女子大学近代文学研究室: 1956.1-2001.5; 18-59)<sup>9</sup> 以及香港政府檔案局 (Hong Kong Public Records Office) 中香港歷史學者施其樂 (Carl T. Smith) 有關佐麻須的資料卡 (HKPRO: CS/1015/00145539, CS/1015/00145547, CS/1015/00145549)<sup>10</sup>。其餘的還有一些根據這些整理而來的重印資料 (日本大百科全書 1994)<sup>11</sup>，又或網上轉載以上資料的條目<sup>12</sup>。這些資料由於體制及形式所限，各有優劣<sup>13</sup>，也並非全部可靠，學者使用時需要極小心。可幸的是，由於佐麻須曾留下工作履歷的倫敦大學國王學院 (King's College London)、牛津大學、英國大英博物館 (British Museum)、倫敦印度辦公室圖書館 (India Office Library) 以及外交部都留有部分佐麻須入職及入學資料，當中不乏他自述生平，並附有推薦人的推薦信，因而我們能作一更確實的對比，補充不足，下面就根據這些資料先作一些簡述。

佐麻須出身於英國的斯塔福德郡 (Staffordshire) 的利奇菲爾德 (Lichfield)，父親為工藝匠<sup>14</sup>，由於家貧，雖然少時已展現語言才能並矢志當外交官，卻無法循正常渠道受良好學校。在當時維多利亞社會，佐麻須只能循極多平民選擇的道路，就是藉著宗教之門，獲得良好入學機會及社會出路。佐麻須早年求學於利奇菲爾德傳道

<sup>8</sup>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有關佐麻須一條，由劍橋大學日本圖書館主任小山騰 (Noboru Koyama) 撰寫，資料多從日本資料而來，極具參考價值。由於 Lily Summers 後來生活極潦倒，因此她的訪問內容不能避免出現傾向誇大佐麻須出身的情形 (Summers (1951))。

<sup>9</sup> 由於 Lily Summers 後來生活極潦倒，因此她的訪問內容不能避免出現傾向誇大佐麻須出身的情形 (Summers (1951))。

<sup>10</sup> Hong Kong Public Records Office, Carl T. Smith 特藏，CS/1015/00145539, CS/1015/00145547, CS/1015/00145549。

<sup>11</sup> 見《日本大百科全書》10 (東京：小学館，1994) 「サマーズ」一條。

<sup>12</sup> 包括 Unforgettable people to Japan 網站中 “James Summers” 一條：<http://www2s.biglobe.ne.jp/~matu-emk/summers.html> (檢索日期 2013.11.30) 及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James\\_Summers](http://en.wikipedia.org/wiki/James_Summers) (檢索日期 2013.11.30)。

<sup>13</sup> 遺憾的是，即使提供最詳盡研究資料的日本，很多戰前日本出版的研究刊物，由於沒有標明資料出處的學術慣例，這也令後來學者無法追蹤出處，及判定佐麻須事跡最真實的情形。

<sup>14</sup> 後人訪問的資料至今無法核實，指佐麻須父母為藝術家，作品藏於大英博物館內，大英博物館並無藏有他們家族的作品。見《近代文學研究叢書》。

訓練學校 (Diocesan Training School of Lichfield; 今天改名為 Diocese of Lichfield)，畢業後，在利物浦附近一所由米頓牧師 (Rev. Samuel Minton 1820-1894) 主持下的學校內擔任教員 (Stanton 1852. 11.25)。1848 年秋，香港首所基督教聖公會學校聖保羅書院 (St Paul's College) 開幕，19 歲的佐麻須跟隨聖保羅書院創校校長士丹頓牧師 (Rev. Vincent John Stanton; DOB unknown- 1891) 到港，一邊擔當他的助理，一邊任學校的英語導師。佐麻須能隨士丹頓到創校期的香港聖保羅書院工作，成為他人生重要轉捩點。

香港開埠不久，教育及傳教事業百廢待興。於 1843 年開始在殖民地擔任殖民地主教 (colonial Chaplain) 聖公會的士丹頓有見及此，要求香港政府撥地建立學校及教堂，發展教區，並望政府能捐助資金，訓練華人成為傳教士，廣傳福音到中國境內，可惜由於政府當時只願意資助更早到港的另一辦學團體——馬禮遜教育團體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成立於 1835 年)，由於馬禮遜父子對中英關係、鴉片戰爭以及大英帝國拓展殖民地領土有莫大的貢獻，士丹頓不得要領下，便決定回國籌款。及後，到了 1845 年後，隨著馬禮遜兒子於 1843 年猝死後，加上英商漸漸北上到中國五港或回國，馬禮遜教育團體的活動變得凋零。另一方面，殖民政府開埠以來，因與本地社群出現嚴重的語言隔閡，政府的命令不能下達，民情不能向上反映，政府無法有效施政，當時的總督德庇時考慮把資助馬禮遜教育團體的金錢，轉到士丹頓自資籌辦的學校中，並希望學校能為政府增設譯員課程，大量培養譯員，解政府的燃眉之急，雙方互惠互利(關詩珮 2014)。士丹頓早年得不到政府資助後，便利用多次返國的機會，從英國熱心教徒間籌募經費，在英國眾多匿名「主愛內弟兄姊妹」籌得資金後，新校在 1845 年開始在香港奠基，並名為聖保羅書院。士丹頓除了把資金帶回香港興辦學校外，更從英國招募得一批有志到中國傳教的年輕傳道人到中國，望他們一邊學習中文，一邊在華人世界學習傳教，期望他們日後能自行到中國成立傳教站，佐麻須就是在這樣的情形下跟隨士丹頓牧師到港的。士丹頓是一位極熱心傳教的牧師，早於中英鴉片戰爭的 1840 年，在沒有任何教會及英國公私團體的庇護及支持下，毅然隻身到中國傳教，因而犯下中國禁教令，於 1840 年 8 月到 12 月間被捕而身陷囹圄，後釋放後同年年底回英。後於南京條約後，再次從英國到香港來，藉著中國開門的機遇成就自己傳教的事業。士丹頓到華傳教及辦學的過程歷盡艱辛，但亦是這原因，他刻苦的經歷獲得教會及眾多信徒的敬仰，佐麻須能成為他的助理，逐一定分享到士丹頓牧師的部分光環。後來，士丹頓於 1850 年因病離港回英休養，英國聖公會調整了來華傳教策略，望大力推動在華傳教工作，遂派出另一牧師史美 (George Smith; 1815-1871) 來港接替士丹頓，更榮升他為維多利亞教區主教 (Bishop of Diocese of Victoria)，專門管理東亞 (日本、中國內陸、香港等地) 教區事宜。佐麻須亦在這機會下認識史美，隨著香港教區的重要性提升，前任殖民地主教與現任維多利亞教區主教都與香港政府有緊密的關係，佐麻須因而得以認識到不少政府及外交部的官員。

現存於香港歷史檔案館內有關聖保羅書院及聖公會的相關紀錄內，暫時找不到佐麻須在書院內確切的工作範圍。不過，藏於英國的傳道會檔案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的檔案中，則為佐麻須寓居香港的短暫日子留下點點足跡。新主教史美在匆匆接替士丹頓牧師上任之後，由於牧區範圍擴大，工作增多，他在分

身處理上海、香港及日本等教區工作之時，就交代隨他從英國帶來新書院導師 (college tutor) 暨署理殖民地主牧蒙奇理 (Edward T. R. Moncrieff)，如何分配書院內各導師的薪水及工作 (Smith 1850.04.5)。佐麻須在書院內擔任普通歷史科 (General History) 導師外，更以 Nicholls's Help To Reading The Bible 作為教材，負責傳經的工作 (Moncrieff 1850.6.8)，他像其他新到港的牧師一樣，利用工餘時間學習中文。施其樂指他於香港馬禮遜教育學校學習，是為第七屆中文班的學生。我們暫時找不到能立即引證這說法的資料，特別是現無法判定香港馬禮遜教育學校有沒有收生名錄，但施其樂的說法是很可能的。我們暫時找不到其他旁證支持這說法，特別是現無法判定香港馬禮遜教育學校有沒有收生名錄，但施其樂的說法是很可能的：第一，當時在香港提供外國人學習中文的機構並不多，佐麻須沒有很多可行的選擇；第二，士丹頓當時積極參加馬禮遜教育學校行政管理事宜，在第 8 及 9 期的馬禮遜教育學校報告中，都看到士丹頓參與經常會議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1846:9; 1847: 4)。不過，馬禮遜教育學校的教學宗旨，恐怕是以教導華人子弟英語為首要任務，而中文課程則可以說非常有限。(Smith 2005: 13) 亦是由於這個原因，我們可以明白，到港後才開始學習中文並只限於工餘時才進修的佐麻須，中文造詣並不會很高。這亦成為了日後他被人詬病中文程度不遜，沒資格擔當中文教授的原因，這點我們在下文會進一步討論。

1850 年，佐麻須本來打算隨著士丹頓牧師回英養病離港之際，自己亦同時回國 (Summers 1852.11.24)。不過，中間遇上一些阻滯，擾亂了他的計畫，他沒有立即回到英國，反而是到了上海生活兩年，並在上海學得一口流利上海話，甚至在這基礎下開始著手翻譯聖經。他在上海生活了兩年後，便回到英國。

### 參、倫敦國王學院中文教授

佐麻須回國的 1852 年，剛好為倫敦大學國王學院開始招募第二任中文教授之際。國王學院中文教席於 1852 年 11 月起開始接受申請，報名不見踴躍。這其實是預料之內，當時英國境內漢學人才凋零，一手創辦學院中文課程暨學院學術委員會成員的斯當東，過去為國王學院尋覓第一任中文教授時，已歷盡艱難，尋遍國內海外，都不得要領。最後在無計可施的情形下，邀請從香港回英國養病的香港總登記官並曾參與鴉片戰爭的譯員費倫 (Samuel Turner Fearon; 1819-1854)。第一屆任期將滿時，斯當東又面對這樣的困局，為重新聘人而苦惱。1852 年 12 月上旬，斯當東寫信到國王大學遴選委員會，指終於有位比較理想的申請。可惜，自己並不認識此申請人，他對這報名者的名字及事情並未所聞 (Staunton 1852.12.3)，言下之意，是未能完全掌握申請者的中文水平、出身以及履歷。斯當東這樣說並不是因為他狂妄自大，顯示自己神通廣大，認識所有可能申請人。由於英國及至歐洲的漢學圈子非常小，懂得漢語的人大多在民間或官方學術團體間互有往來，而斯當東一直高度參與國內外各種官方及民辦漢學活動，因此，他大概得知行內每位漢學專家，並不是不可能的。事實上，斯當東在政界及文化界的聲望遠播，作為中國通的他在社會上人盡皆知，而他是為倫敦大學國王學院創立中文課程的創辦人，也不需要多作介紹。佐麻須對此固然也有所聞，因此，他在申報教席時，在遞交的履歷書及相關文件後，再另附一信函給斯當東，除了自我介紹外更向他致歉，指自己在申請教席前

沒有機會拜會斯當東是於禮不合的。佐麻須順帶說，自己早於 1850 年計畫回國之際，已有意聯絡斯當東(Summers 1852.11.22; Summers 1852.11.24 )，而且當中很多熱心推動漢學的人，亦已準備介紹雙方認識，讓剛回國的佐麻須能增加社會人脈。

在 19 世紀的學術環境，並不像今天大學聘請大學教授般，有就職講座 (Job talk)、面試(job interview)及試教課堂(trial lecture)等等的聘人流程。在斯當東不認識申請人的出身、能力及學術背景時，佐麻須的推薦信就顯得特別重要。此外，我們不能忽略的是，聘請國王學院第二任中文教授的環境因素，是在一個非常倉促及突兀的情形下發生的。而誘發這次重新聘人的原因是出於宗教上的考慮，這原因更支配著其他更正常的考慮條件，譬如候選人的中文能力。1850 年起，斯當東發現他於 1846 年親自聘請的第一任中文教授費倫，並不是英國國教教徒，在有違國王學院作為國教大學的辦學宗旨的考慮下，斯當東認為要不終止費倫的任期，就是把講座移到香港。即使當時的國王學院認為費倫的表現盡責，斯當東亦堅持不能續聘費倫，因為成立中文科在國王學院的本意，是為了鞏固大英帝國在華的政治、經濟、教育及宗教利益。因此，在聘任第二任人選時，斯當東在 1852 年 11 月刊出招聘廣告中列明，優先考慮國教申請人。而可能基於這種限制，報名人就更不見踴躍。

斯當東雖然對佐麻須認識不深，但由於佐麻須獲得宗教界及政界舉足輕重的人仕極力推薦，因而他順利擠身英國大學學府之門。這些推薦人包括 Peter Cracroft 將軍(1816—1865)，在英休養痊癒的史丹頓牧師、還在香港的史美主教。單從這名單，其實佐麻須要取得講席已經是十拿九穩的了。除此之外，他還有第一位到上海傳教的美國聖公會主教文惠廉牧師 (Rev William Jones Boone; 1811-1864) 及上海聖三一教堂本堂牧師合信牧師(Rev John Hobson; 1849-1862)等人共同推薦，在國教學院倫敦大學的立場下，佐麻須的申請實在已穩操勝算。各人信中都異口同聲指，佐麻須為人勤勉、好學，更保證了他的人格及能力，而且他若能成為中文教授，對基督教在中國傳教事業一定有很大的幫助。特別是士丹頓的信更是寫得極坦白，指出佐麻須的優點在於他擁有孜孜不倦的學習精神，他掌握多種語言，包括法語、德語、拉丁語、希臘語以及希伯來語等，這有助從多角度入手理解中文。此外，他對學習中文的艱難程度應有深刻體會，因而更能從初學者的角度去任課。如果我們了解當時學習漢語的大歷史環境，即是沒有太多以英語撰寫的優質教科書，以及佐麻須當時略為粗淺的漢語程度，我們就更明白士丹頓意在言外的深刻意義。

雖然當時招聘廣告並沒有列明需要多少封推荐信才合乎要求，然而佐麻須似乎能找到非常龐大的宗教隊伍在背後支持他，這就說明了他的能力。固然，佐麻須自己的應徵信件，亦提供了一定的實力證明，顯示了他的專長。佐麻須明言，在中國期間學懂三種方言，包括廣東、上海以及中國官話(court or mandarin dialect )，並指自己的上海話最為流暢，他認為，上海話對英國在華發展極度重要，原因是上海居於中英貿易的重要樞紐。此外，他並指自己在學習中文過程中，非常注意聲調及發音，而且，自己擅長以中國書寫工具書寫漢字，特別是以毛筆書寫漢字，這點恐怕在當時的英國及在華外國人而言，都不是一蹴而得的成就。為了證明自己所言非虛，佐麻須就更附上一份學習漢語的雙語書單。

書單是以毛筆字撰寫，當中的字體尚算公整，由此亦可見佐麻須對自己的漢語書寫程度甚有信心。他在書單中指出，自己能掌握「中國經典」，包括《四書》及

《詩經》、《孟子》、《三國志》等歷史體傳，以及翻譯基督教聖經的新文體。此外，他指自己熟讀不少中國詩；雖然整體學習漢語的歷程只有4年，加上自己在華生活因意想不到的事件被迫中斷，然而在漢語的書寫系統、文字、句法結構方面，則有一定信心。另一方面，他也表明自己口語雖未達母語者的流暢程度，但日常會話、聲調以及朗讀各方面都足以應付，甚能掌握諺語。整體而言，佐麻須在信中表達的是自己有足夠能力勝任。佐麻須隨陳函附上的書單，是他的部分藏書也是中國人讚譽推薦的讀本。他精挑細選這幾本參考書在申請信內，不單反映著他的漢語水平，更反映了當時學習漢語的一些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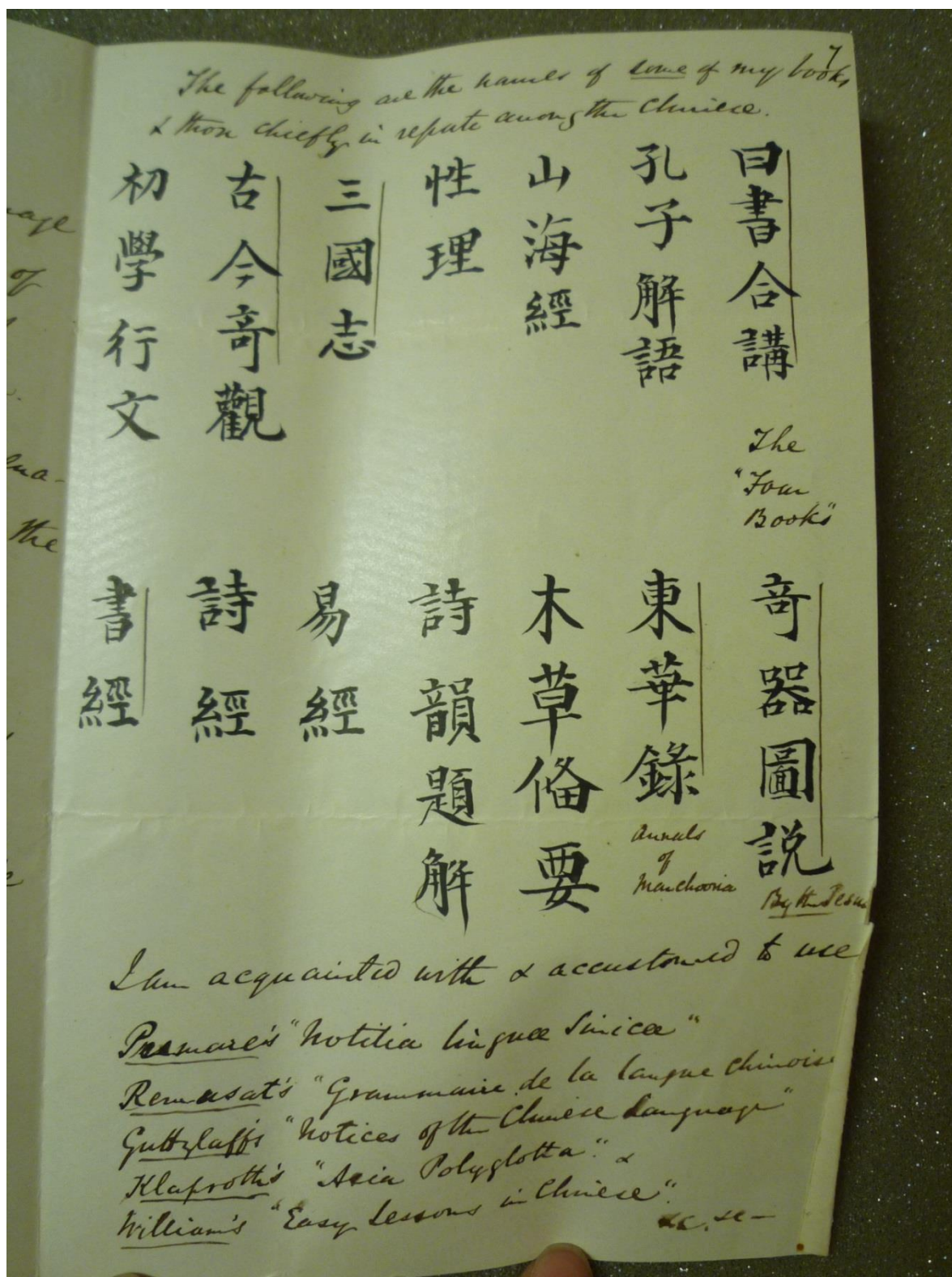


圖 2 鳴謝：倫敦大學國王學院<sup>15</sup> KCL/IC/S50

<sup>15</sup> 本文各項出自倫敦大學國王學院檔案資料及圖片均取得學院徵用及引用權利，請勿隨意轉載原文資料。

從圖二可見，字體清晰秀麗，然而為方便討論，筆者仍然整理如下：

四書合講〔The Four Books〕  
孔子解語  
山海經  
性理  
三國志  
古今奇觀  
初學行文  
奇器圖說〔By the Jesuits〕  
東華錄〔Annals of Manchuria〕  
本草備要  
詩韻題解  
易經  
詩經  
書經

另一方面，教席設於英國，教學對象固然是英語世界的學生群，因此，佐麻須的教學方向及教材，自然是以英語或其他常用歐洲語寫成有關中國文化、漢語及文學的讀本。因此，他在申請信中亦列出不少這類參考書，這包括：

Joseph Henri de Prémare, *Notitia linguae sinicae* (Malaccæ: cura Academiae anglo-sinensis, 1831). [馬若瑟：《漢語札記》] 筆者註：佐麻須只列出西語書名，所有中文書名及出版資料均為筆者所加；下同]

Abel Rémusat, *Elément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 ou principes généraux du Kou-Wen, ou style antique, et du Kouan-Hoa, c'est-à-dire de la langue commune généralement usitée dans l'empire chinois* [雷蒙沙：《漢文啟蒙》；另註：原著漢語書名]

Karl Gützlaff, *Notic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wo Letters On The Chinese System Of Writing]* [郭實獵：《漢語筆記》]

Julius Klaproth (Julius von Klaproth) *Asia Polyglotta* (1823) [克拉普罗特：《亞洲諸種語》]

Samuel Wells Williams, *Easy Lessons in Chinese: or Progressive Exercises to Facilitate the Study of that Language, especially Adapted to the Canton Dialect* (Macao, printed at the Office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42). [衛三畏：《拾級大成》；另註：原著漢語書名]

從這裡的中英西語書單可見，他的學習內容非常龐雜、分類不清、各種書深淺程度不一。這固然反映了當時西人特別是英國社會學習中文的一大難題，就是沒有結構清晰、循序漸進的學習教材，因而不得不參考在歐洲出版並以非英語撰寫的著作及研究專著，又或者傳教士在亞洲出版的教材，以此協助學習中文。他的參考書目的另一特色就是，他非常廣泛地涉獵了前人的研究，當中有一些是當時極流行的漢語教科書，如馬若瑟以拉丁語撰寫的《漢語札記》、法國漢學巨擘雷蒙沙的《漢文啟蒙》，以及衛三畏的《拾級大成》；另一些則是比較偏僻，如郭實獵跟語言學家在書信討論中國語言特色後出版而成的《漢語筆記》(Gützlaff 1841: 7-9)，當

中只有寥寥數頁，而且由於為書信，無論內容如何蘊藏深義，似乎並不算是深淺有序的學習綱領或教材。總括而言，這書單雖然反映了佐麻須用功甚勤，細大不捐的個性，但這樣迂迴的學習途徑，學習成效不會很顯著。不過這亦是十九世紀英國漢學發展的一個必然階段。固然，佐麻須能參考歐洲各國語言（如：法文、德文、拉丁文）的著作，以一個比較廣闊的視角了解漢語理論層面，這點亦是一個優勢。不過，在當時社會環境而言，擁有拉丁文、德文及法文程度的英國人，亦是英國菁英階層的基本能力而已。能否大量參考這些歐洲出版的書籍，在當時學習中文資源嚴重匱乏的情形下，才是更深切的問題。

1852 年 12 月 11 日，國王學院通知佐麻須獲大學方面委任為第二任中文教授，正式年期為 1853 年 1 月 1 日起，年薪 100 英鎊(Cunningham 1852.12.11)，首任為期五年，佐麻須並於一月履新。國王學院並立即在各報刊雜誌上刊登授課資訊，其中在 1 月 22 日一份倫敦最有名的文學周報《雅典神廟》(*The Athenaeum*) 上刊登資訊如下(*The Athenaeum* 1853)<sup>16</sup>：

倫敦國王學院校長敬啟  
中國語言及文學科

佐麻須教授（歷任香港聖保羅書院導師 tutor）將於下周起逢周一下午三時於本院開設中國傳統語言及本地語科目。此致

佐麻須被聘為國王學院第二任中文教授的消息傳回香港，當時引起了不少騷動。曾在香港及新加坡當法官，見盡兩個英國新佔領殖民地缺乏雙語人才及法庭譯員的諾頓-崎畬 (Norton Kyshe)，就在他鉅細靡遺的資料彙編《香港法律與司法制度資料篇》(Norton Kyshe 1971: 348)，作出非常不客氣的批評。諾頓-崎畬指佐麻須在港只是生活了極短的時間，中文水平一般，實非有能力勝任 (incompetent) 教席之輩。諾頓-崎畬並不懂得中文，我們很難說出他的評價有多客觀。然而香港及新加坡兩地在開埠數十年間，嚴重缺乏譯員，甚至嚴重到影響了法庭開審以及日常政府運作。兩地殖民地政府及法庭都曾出盡各種辦法羅致島上懂得漢語的外籍人士成為譯員。如果佐麻須的漢語程度達中級水平，恐怕他亦無可避免地曾協助一些基本法庭翻譯工作或曾參與香港政府翻譯事務了，以此解決譯員之荒(關詩珮 2012: 174-194)。況且，香港及新加坡兩個蕞爾小島上有多少西人懂得中文，各人程度如何，恐怕在外國人小圈子中，大家早已瞭如指掌。不過，諾頓-崎畬的批評並不是孤例，在下文我們會看到，在 1846 年已在香港最高法院擔當譯員的威妥瑪，後來亦同樣批評佐麻須，暗示他程度不足。在討論佐麻須與威妥瑪的明爭暗鬥前，我們先看他如何在競爭的環境，裝備自己的學術能力及鞏固自己的地位。

<sup>16</sup> *The Athenaeum: Journal of English and Foreign literature, Science, and the Fine Arts, London Saturday, January 22, 1853. No. 1317.* 分類廣告以字母排列，這則廣告位於顯眼的左上角第一行第一欄的位置，不難被每天熱心剪報存檔的法官 Norton Kyshe 看到（見下註）。

## 肆、漢學知識的生產：翻譯、教科書、中文課程

諾頓-崎畚批評佐麻須漢語水平不足，學習時間總共不過短短幾年就被聘為中文教授，不能勝任，這是無可厚非的。如果我們以倫敦大學前兩任中文教授學習中文的年期作一對比，也許能得出一個大概印象。固然，學習語文的成就，亦難以以時間長短作衡量單位，不過以多種資料對比，似乎是唯一能帶出更客觀評價的方法。全英第一任中文教授，亦即是倫敦大學大學院紀德（Rev Samuel Kidd; 1804-1843），在 1837 年成為中文教授前，從 1824 年在倫敦跟從馬禮遜學習中文，同年起被派到馬六甲擔任英華書院校長期間，一邊繼續學習，一邊翻譯及教學，長年在華人圈子中生活，到回英出任大學教授前，已有十多年的在地生活經驗。他上任後，出版了他的講座《漢語結構及性質》以及後來更廣泛的課題《中國》(Kidd 1838; Kidd 1841)，兩書並不特別深奧，水準並不特別卓越，而今天看來的確有不少令人費解的瑕疵及謬誤，譬如指中國象形文字與古埃象形文字為同一形體及來源(Twitchett 1862: 6-7)。但由於他能說流利的客家話及南方官話，因此可見，他在研究上的貢獻，還是滿足任課的需要（教授會話技巧），他都符合要求。全英第二任中文教授費倫（國王學院首任），自小寓居澳門及南中國海，隨著英商經常進出廣州及香港，他能擔當鴉片戰爭及香港殖民地政府的口譯員，日常對話絕對流暢，雖然他入職前後沒有發表學術著作，甚至沒有出版就職演講，不過，這更能反映了國王學院的課程重點，在於傳授漢語應用知識及實際翻譯技能罷了！我們不知道佐麻須是否知道別人的批評，更不知道他是否接受諾頓-崎畚的意見。但佐麻須若要在短時間改變別人對自己中文程度的印象，要證明自己的能力及堵塞別人的批評，積極出版及發表著作，可以說是唯一的出路。

佐麻須在上任後，便立即出版了多項研究，這包括他於 1853 年 4 月 13 日發表的就職演講《中國語言及文學》(*Lecture on the Chinese Literature and Literature*)，全書 38 頁，後附有中國部首及佐麻須的手繪象形文字及圖文說明(Summers 1853a)。全書結構分作兩部分：前者談論中國語言的特色，特別是與歐洲語言的分別，當中一些基本說明，包括漢語並不像屈折語有語尾動詞變化，欠缺單數或眾數的分別，以及基本漢語造字造詞特色，如獨立語、實詞虛詞的結構，漢語史的發展等。而後部分即是自第 30 頁起，簡介中國文學的諸種經典文本，譬如《詩經》、《書經》、《春秋》，以及一些基本工具書，如《佩文韻府》、《康熙字典》等。全書雖不算力作，像當時一般的漢學教材一樣，全書沒有重心，泛泛而作，明顯缺乏統一深刻主題。不過，我們要明白，今天漢學（內裡無論是漢語、還是歷朝文史哲繁博精深的體系，甚或每一相關體系內的細部分野，如漢語內的語言、音韻、字詞、各自的共時及歷時性研究，又或是比較語言研究等）的發展，事實上已出現高度分化。在十九世紀中葉的英國，漢學發展只是剛起步，佐麻須在應聘到出版的這短時期之內，就能整理出一本讀本，這反映了他的勤奮外，亦看到他能以自己極好的歐洲語，借鑑歐洲漢學已有成果挪為己用的努力。他在每個章節中都盡量提供比較豐富的資訊，如某位漢學家已提出相關概念的說明，可見他已作了徹底的資料搜集，提供讀者基本而又全面的認識。這點，恐怕亦屬於他的貢獻，不能完全忽略他的功勞。我們要特別考慮，斯當東本人對於歐洲漢學的認識，絕不粗疏，他一定參考了佐麻須這方面的，認為即使會話能力不足，亦絕非極大問題。

同年間，佐麻須把之前已在上海著手翻譯的福音書《上海方言譯若望福音》(Summers 1853b)，在倫敦付梓出版。他並把這書敬呈給斯當東，在扉頁銘謝斯當東為「獻給那位中國的良好摯友以及寬宏慷慨的漢學及中英文學贊助人——斯當東爵士」。這本書是他以上海話標音作為方法，以羅馬字母拼寫出來的語音翻譯 (transliteration)，全書並無一個漢字，讀本設計方針純粹為外國人學習讀音而設。若就內容來看，似乎無甚可看。特別是後來當英語世界學習了威妥瑪拼音方式(後為翟威拼音 Wade-Giles)，及華人世界亦全面接受了 1958 年中國漢語拼音方案後，佐麻須的嘗試受到唾棄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不過，在 1853 年，當整個英國社會並不全面掌握學習漢語方法，外交部本身對於中國有多少種方言，學生應學習哪一種方言也並無法分辨的時候，佐麻須的努力其實是有一定的意義的。若我們能將他置回在他的時代中作評價，事實上亦不會認同下文即將會討論到，外交部對他猛烈的批評，而能以一個更廣闊的角度評價他的貢獻。同樣地，只要回顧佐麻須時代的英國漢學教授，我們即可得知，他們亦同樣側重傳授中國方言（廣東話、客家話或夾雜北京官話），而佐麻須之後的牛津大學中文教授理雅各 (James Legge; 1815-1897)，由於他的教席與外交部譯員課程全無關係，他享有較高的學術自由，因而即使他並不以北京標準官話任教，對他的傳道授業的工作，並無影響。亦即是說，佐麻須以上海話出版的上海話讀本，在英語世界並沒有出現統一拼音方案的共識下，本身是一項難能可貴的嘗試。他在書首導言中，詳細地說明了上海話的音調、發音部位，語言特色等語言知識外，更明言上海處於中英貿易及稅務的重要關口，因此他認為學習上海話對英國在華利益至為重要。亦即是說，他的貢獻及他的翻譯初衷，與之前任何一位以英語作為母語的人以羅馬字標音方式註出中國方塊字讀音的方式，如馬禮遜等以南方官話，或與他同期的威妥瑪以北京話注音的行徑，沒有很大的差異。當然，三人的語音準確與否，就需要留待歷史語言學者進一步研究。

這樣急於出版兩本著作奠定自己的學術地位之外，佐麻須更希望以另一種形式證明自己的實力。佐麻須似乎也感到自己不足之處，他於任教國王學院的期間，同時報讀牛津大學。固然，學歷與實力並不一定有直接關係。佐麻須的前兩任中文教授，其實並沒有顯赫的大學畢業文憑。不過，如果他的夢想是進入外交部，甚至踏足政界，那麼就絕對不能缺少牛劍或同級大學的畢業文憑了。瓊斯 (Raymond A Jones) 清楚指出，十九世紀外交部有大概半數 (近 47%) 是牛津及劍橋大學的畢業生，而畢業生鞏固著的社會及人際網路的意義，比反映個人智慧或實力更重要 (1983: 15; 142-143)。外交部在聘人方面，雖然一直被詬病為十九世紀英國政治架構最封閉、最黑箱作業的部門，聘人只求熟人推荐，但某層面反映著的事實是，政界、貴族菁英及上流社會一直利用體制力量 (大學學歷、宗族血統等) 維護階層利益的事實而已。佐麻須要擠身其中成為一員，沒有顯赫的出身，起碼要有一張美麗的入場券。當時牛津大學的學制與今天並不一樣，絕非人人都享有入學權利，沒有家世或特殊背景，事實上極難以獲得取錄。佐麻須報讀牛津大學當年已為 25 歲，年紀超過一般正統入學的學生，但由於他成為國王學院中文教授後，對他叩門有極大的幫助。再加上十九世紀中葉，牛劍兩校開始因應社會的要求而逐步放寬入學的階級門檻。當時的牛津大學，不需要學生入學前選定報讀固定某一學

科，或入學後報讀固定學位，內有既定的課程範圍。當時的學生，可以先選讀一些學科，完成後再統計總學分申請畢業。佐麻須於 1853 年 12 月 17 日登記 Magdalen Hall（在 1874 年後已重組並成為赫佛（Hertford College）成為牛津大學學生（Foster 1887-1888; 1371），修讀三年後，他於 1857 年 6 月 23 日考試，考的是他比較擅長的語言及人文學科的科目，包括古希臘悲劇家歐裡庇得斯（Euripides）的劇作米蒂亞（Medea）及赫卡柏（Hecuba），西塞羅（Cicero）的喀提林（Catilinam），以及歐幾里得（Euclid）的幾何（Geometry），這些學科的組合反映了他傾向古典人文學科<sup>17</sup>，全部合格後，再報讀幾個相關科目，便可獲得文學士學位（Oxford University Archive UR 3/1/3/1）。不過，不知出於何種理由，他並沒有完成所需課程，因此也沒有獲得學位。他中途輟學雖然好像極為可惜，可是就某層次而言，他已經達到入讀牛津的目的了。

入讀牛津大學的機緣為他提供了新一層的身份資本，也提供了他學術界發展的一個重要踏腳石。當時的牛津大學學位，畢業與否都允許學生付費成為學校的會員，稱之為榮登書院名錄（College books）（Brock & Curthoys 1984）。各會員同時自動獲得國會投票權，在十九世紀之時，牛劍兩所大學在國會有固定議席，而在當時的社會並非人人都有平等投票權的情形下，榮登書院名錄似乎是極重要的身份證明之一，而且同等重要的就是，能參與選舉大學校長投票，因此，對社會人士而言，手持影響國會及大學發展的一票，似乎極度吸引，更是反映自身身價的一種手法。佐麻須在日後直接寫信到外交部謀求官職時，他作自我介紹時，牛津大學的成員的身份是他最為強調的部分。

另一方面，入讀牛津的機會，亦穩固了他的學術貢獻。他通過牛津學生的身份獲得牛津出版社的資助，出版了第一本在英國本土出版的漢語教科書。在十九世紀的英國，漢語被看成是「異常及困難的語言」及「最不可知的語言」，可以想像，整個社會對漢學的認識不及皮毛階段。英國社會並沒有出現過去歐洲般出現的中國熱，及至十九世紀三十年代要成立首個漢學教席時，社會反對聲音之巨大，並不是我們今天能想像。因此，英國國內長期沒有出現適用的漢學教材，一點也不令人意外，這只是因果關係互為影響而已。過去，學習中文的書籍都在海外出版，譬如馬六甲、印度、香港、澳門、廣州等地。基於這個原因，牛津出版社亦看到本土出版漢學教材的商機及重要意義。佐麻須的專著《中國語手冊（*A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是把國王學院中文課程的講義整理編成教材（Summers 1863a）。這本書開宗明義說這是國王學院中文課程的教科書，寫作對象是任何有志到中國並要學習中文的人士，適合初學者之用。由於佐麻須的歐洲語言能力不錯，而且勤勉努力，所以他以此彌補了他某程度上漢學資歷不夠的短處。他在他序言中，回顧了海外出版的多種中文教材，從耶穌會拉丁語的教材說起，順序的法國的漢學巨擘雷蒙沙（Jean-Pierre Abel-Rémusat; 1788-1832）、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及馬殊曼（Joshua Marshman; 1768-1837）等的教科書。漢學家德庇時就曾稱這教科書對初學者極為有用，而且由於是第一本在英國本土出版的漢語教科書，彌足珍貴（Davis 1865: 60-61）。無論價值如何，佐麻須撰寫這書的目的，似乎並不是出於純

<sup>17</sup> 中村論文指佐麻須為報讀神職授任而報讀牛津大學，從學科上的內容而言，佐麻須報讀的學科更傾向古典人文學科，而要取得神職授任，學科內容大部分是圍繞宗教及聖經問題。但更重要的是，佐麻須在 1863 年獲得牧師資格後，他一生的業績其實都不在宗教上。

粹的學術目的。在下面的章節我們會看到，他的寫作動機中，似乎有不少實際功利考慮，這些考慮也許蓋過純粹學術性討論，或是純粹為本土奠下漢學發展里程碑的初衷。整體而言，他的研究工作只限於上任後一段非常短暫時間，之後則後勁不繼，他既非忙於宗教事業，於 1863 年正式獲得牧師資格後，亦從無熱心投身宗教事務，他的心志似乎另有出路。

### 伍、帝國官僚：與威妥瑪的競爭

佐麻須上任國王學院的 1853 年間，其實亦是國王學院與外交部進入新伙伴關係的歷史里程碑(Kwan 2014: 1-20)<sup>18</sup>。斯當東在 1846 年成立國王學院中文教席的時候，已設計了一個基本藍圖，就是要以此用作訓練在華譯員的基地。因此，教席成立後，他於 1847 年立即寫信到外相巴麥尊爵士(3<sup>rd</sup> Viscount Palmerston; 1784-1865)，向他進言，要求即將被派到中國的年輕外交部官員先於國王學院接受中文教授費倫為期一至兩學期的基本訓練，讓他們出發前先學習漢語，掌握基本知識(Foreign Office (下簡稱 F.O.) 17/ 135/ 10 [12-April- 1847])。巴麥尊雖然為斯當東的摯友，然而卻沒有立即同意。他指現存體制上的種種限制，因而不能魯莽地改變派遣到華人員的程序，而且每年的空缺亦非常不穩定，這樣長遠徹底地改變分配資源方法，並不適當。因此，現在最可做的，就是儘量指派已經掌握基本漢語的人員出發。這可能是正確的，但亦可能反映了巴麥尊因循守舊，好戰專橫而把內政弄得一潭死水。外交部譯員計畫改革的曙光，到了 1854 年才初次出現。外交大臣克萊頓伯爵(Earl of Clarendon; 1800-1870)及英方商務監督及全權代表包令(Sir John Bowring; 1792-1872)攜手合作，全面著手整頓外交部，並重新規劃外交部訓練譯員計畫(student interpreter programme)(關詩珮 2013: 1-51)。在這階段後，外交部的體制以及行政效率，出現了翻天覆地的改變。這種改變，首先直接影響的是對華譯員的培訓，亦即是開創了中國譯員計畫，然後再發展日本、韓國、越南、暹羅等東亞譯員計畫。我們先討論中國譯員計畫對國王學院的影響，日本譯員計劃的梗概將留待中國譯員部分後繼續討論。

外交部規劃在選取派遣到華譯員的基本要求以及程序亦有革新，其中一個最大的改變，是學員先在英國接受基本漢語訓練，並集中在國王學院學習，全英僅有中文課程的大學。而在選取學生方面，可以說是一個拔尖計畫，由國內最頂尖的七所大學學府的校長提交外交部，提名核實後，再接受漢語課程。由於國王學院與外交部緊密合作關係，亦由於課程成立的歷史，倫敦國王學院占有極大比數的提名權(F.O. 17/307)。包令敬呈給克萊頓的信中指出：「如果國王學院或英國其他大學學府能提供漢語基本教學，奠下學員日後學習基礎，我實在是感到萬分欣慰。這樣，要是我能進一步提供意見給閣下參考，英國亦從此可能出現常規譯員。國王學院應參與課程發展，以及在我們聘用候選人之前協助考核學生進度。這樣一來，從已有的步驟可見，計畫定能於日內圓滿成功，而我將會繼續向您彙報到學員的情況。」(F.O. 17/217/323-324)包令更同時公布〈中國設立譯員備忘錄〉(Memorandum on the

<sup>18</sup>有關倫敦國王學院中文課程成立原委及與外交部譯員課程的關係，我已在另文處理，在此不重複細述。本文展現的討論，多為之前文章沒有引用的材料。見關詩珮(2013: 1-51)及 Kwan (2014:1-20)。

Interpreter Establishment in China), 詳細地回顧過去數年英國漠視學習漢語及翻譯的惡果, 因此訂出未來發展綱領, 將來在華的外交官員懂得漢語將會獲得優先晉升機會。如果我們仔細閱讀〈中國設立譯員備忘錄〉, 就會明白包令在提出新計畫之前, 曾拜訪斯當東, 斯當東與他全面檢討了各在華譯員的質素及潛力, 更提供了實際的發展藍圖。我們甚至可以推斷, 整個派譯員到華方案的梗概到具體細節, 大體上都是來自斯當東。原因是國王學院在居中擔當「課程發展, 以及在我們聘用候選人之前協助考核考生進度」, 絕對是斯當東作為國王學院校內學術委員會成員的角度提出的, 這樣, 國王學院一方面有自由協調學術工作, 另一方面亦能擔當外交部的計畫執行單位。換言之, 斯當東之前於 1846 年提交給巴麥尊爵士胎死腹中的計畫, 終於在外交部人事交替後得以實現。

外交部在 1854 年起, 委任國王書院成為訓練譯員的重鎮(ibid)。大學方面極隆重其事, 在校內行政會議內指中, 對於能獲選成為訓練譯員的戰略點, 感到萬分光榮。外相指出, 若學院能協助鼓勵學習這異常困難的語言, 那將是國家利益所在, 特別是能突顯國王學院的身份——全英國唯一設有中文教授講席的大學(The Calendar of King's College London 1854-1855: 35-44)。

從這樣看來, 國王學院要落實執行外交部的譯員培訓計畫, 就要在行政、教學、資源分配、課程方面都就要作出適當的安排。所謂行政上的配合, 是國王學院校長每年都要擔當推薦人的角色, 在畢業生中物色整體成績優異以及漢語成績優良的學生, 再推薦給外交部。外交部落實提名後, 考生考試合格及畢業無礙後, 便能簽署契約 (bond) 派送到香港, 由香港英方商務監督及全權代表分派到各口岸的領事, 進一步接受在職培訓及實地工作的鍛鍊。這個模式到 1860 年英國公務員事務局(Civil Service Commission)成立, 革新招聘全英公務員的統一方案後, 才又一次出現了結構性的改變, 這部分下文會繼續討論。如此看來, 國王學院的中文教授, 就更是這計畫的靈魂人物, 原因是課程內的大小事務, 包括學術內容及實際語文知識, 如課程實施方針、課程深度、學習目標及成效、甚至學生的水平等, 全部都是中文教授負責規劃及評估的工作範圍。另外一點是, 中文教授還要在學員完成課程後簽發漢語水平證書, 提交給外交部作為證明。不過, 即使如此, 我們也實在不應本末倒置, 認為對於佐麻須的職責而言, 外交部的課程是主, 國王學院的課程是副。外交部委託國王學院教授外交部教授中文課程, 協助培訓譯員, 對任何國王學院教授及員工而言, 是國王學院與外交部兩機構的合作而已, 課程亦只是建基在國王學院原有的中文課程上而已。不過, 從佐麻須的反應可見, 他似乎把外交部的工作凌駕在國王學院之上。

首先要指出的是, 從他服務國王學院歷年的紀錄可見, 他本身並沒有全心全意投入學院的教學。在教學數年間, 他常常希望在外面招攬私人學生, 有時甚至要求在外面授課。對於這些要求, 國王學院全部都從寬處理, 認為只要學生都正式向學校付費記錄在案, 佐麻須只需照足上課時間授課, 國王學院允許他有一定的上課自由(Cunningham 1853.3.4)。不過, 為了對佐麻須有一公平的評價, 我們也要指出佐麻須上任後, 第一個學期就有 6 位學生入學(Cunningham 1853.3.3), 對國王學院以及當時整個英國而言, 學生人數的攀升是非常值得鼓舞的事情, 特別是當我們與他的前任及後來情形作一對照: 國王學院第一任漢學教授費倫任教之時, 收生長期不足; 而即使到了劍橋大學於 1888 年成立中文教席時, 學生人數也一直偏低, 有時甚

至一年也沒有一名學生。從這裡可見，佐麻須的宗教出身及非常活躍於學術體制外的背景，在當時英國有一定的號召力，能吸引到不少學生。不過，可以說，亦是這個原因，反映了他並不特別看重學院的工作。固然，工資微薄，可能令他不得不身兼數職。不過，與此相映成趣的是，他卻極度積極參與外交部的工作，而事實上，外交部的工作卻沒提供額外收入，這裡反映的可能是，是他積極討好外交部，似乎希望利用學院跟外交部合作的契機，爭取表現，成就自己一直投身外交官的夢想。

其中我們可以以幾件事例，說明他踰越職分的行為。首先是，佐麻須於每年要向大學校長提交優異學生名錄，經校長核實提名上交外交部。在選拔學生的過中，中文教授還需提交報告、教學提綱，以及每位學生進度及成績。佐麻須在提交的報告中，指自己為了培訓他們，9 個月內都收留學生在家一起生活，從無間斷，一起學習(F.O. 228/232/148-151 [1857 June 9]; F.O. 228/250 [1858 June 25].)。有時，他甚至越俎代庖，鼓勵學生寫信到外交部，詢問聘用情形。其中一名學生狄范博(Arthur Devenport)寫信到外交部查問自己取錄情形如何，他指收到佐麻須教授暗示，自己在外交部考生排名表中位列第四，然而在校內排名他卻名列前茅的一位。他並向外交部質異自己為何由第一降至第四，這不單大大影響了他學習的心情，更影響了他以後執勤時的表現。外交部斷然回信指，根本不知道他所言何事。並指要求他自己向國王學院查問因由(F.O. 17/ 362/ 53 [5-January-1861])。事實上，國王學院中文教授的即使如何熱衷教學，也不應透露學生考試排名，更何況，他的職責只是向學校推荐有潛質的學生，而非外交部與國王學院的直接代理人。而無論學生最後能選拔與否，其實都並不在他的控制範圍內，可惜他的反應卻令人覺得他做事不知分寸。

另一件例子則是，斯當東於 1859 年去世後，佐麻須於 1861 年 1 月 29 日寫信到外交部，要求外交部捐助以斯當東為名的獎學金。他甚至把國王學院通知附函給外交部，希望他可以把外相的名字放在宣傳小冊子內(F.O. 17/ 362/ 223[ 29-January-1861])。我們在國學院的會議紀錄內，沒有發現國王學院發起籌辦斯當東獎學金的紀錄。即使有，根據學院的多年慣例，聯絡外交部的工作一定由校長直接負責，就好像每次提名學生事宜一樣。佐麻須的行為，似乎會招人誤會，是想利用斯當東的名聲，獲取外交部的信任及良好印象。外交部回函指，外交部無意亦絕不可能贊助個別機構資助中文課程，而且，要把外交部課程寫在國王學院的招生章程上是絕不適合的(F.O. 17/ 362/ 273 [13February 1861])。

這些事情都隱隱反映了，佐麻須心思不專，他似乎只是一心藉著以國王學院作為基地，設法擠身外交部成為要員。終於，在 1861 年他利用外交部改革的契機，以此作為機會，直接要求加入外交部(F.O. 17/ 363/ 241[April1861])。1860 年英國在國會主導下，成立了英國公務員事務局 (Civil Service Commission) 全面統籌了全國各部門皇家公務員招聘，讓以後皇家公務員招聘在公平、公開以及統一時間框架內舉行，外交部招聘譯員的過程亦不能倖免，必須納入統一招攬機制內進行。在檢討招聘外交部譯員計畫時，就特別請了相關單位及屬下人員提供意見。當時，外相羅素爵士具體參考了時為漢文正使威妥瑪的建議書。1861 年威妥瑪謹呈新外相羅素伯爵(John Russell, 1st Earl Russell; 1792-1878)的「語言研究課程大綱」備忘錄(‘Memorandum by Wade to Russell outlining program for language study’)( F.O. 17/351/120 [15 Mar 1861])，指出譯員學生在倫敦的預備課程其實並無特別大的幫助，

到華後的在地訓練實比一切重要。事實上，早在 1854 年，亦即是佐麻須剛剛上任國王學院一年後，威妥瑪就寫了第一份的建議書「學習漢語備忘錄」(*A Memorandum on Respecting the Study of Chinese Submitted to John Bowring (1854)*) (F.O. 17/216/335 [9 Oct 1854].)，通過包令上傳到當時的外相克萊頓伯爵 (Earl of Clarendon; 1800-1870) 要求改革譯員課程。在第一份備忘錄內，威妥瑪已指出國王學院課程的若干問題，其中最關鍵的是，要在倉促的一至兩年的基本課程內教導三種方言，幾近乎不可能。這樣不單反映出設計課程者並不高明，也可能隱隱看到國王學院教授程度不高，不能明白外交部需要培訓譯員，是需要與中國官方官員溝通，因而應學習北方官話。當時威妥瑪在報告內就指：

我不能肯定佐麻須教授提供的基本講座對什麼學生有所裨益。任何歐洲人嘗試在一指定時間或同一時期教授中國任何三種方言，本身就說明了這位歐洲老師不可能完美地學習三種的任何一種，而這正是佐麻須教學綱領部份的情況。如果每年有更多學生譯員能在英國跟從中國老師，這就能確保即使學生還未曾到中國居住，仍然可以合資格成為譯者，且將有更多可造之才獲提名參加這個計畫<sup>19</sup>。

不過，外交部當年並沒有立即全部接納威妥瑪在 1854 年的建議內容，只資助他繼續編輯漢語教科書作譯員課程之用。原因是，當時外交部還未能掌握外交譯員課程的發展方向，而且在 1854 年，其實還未在北京設領事，譯員主要被派到香港及各個港口，學習官話的急切性與其他方言同樣重要。另一方面，雖然從這建議可以看到威妥瑪的遠見，但是，對於威妥瑪的實際工作能力，外交部還未完全掌握。威妥瑪自鴉片戰爭後，要求放棄將軍身份轉為譯員，外交部曾對他的志向及判斷力表示質疑。再加上他曾多次婉拒外交部的提拔，目的是希望可以專心學習漢語，對外交部而言這根本是不設實際。外交部並非大學機構，外交專員的工作不能只以研究為主。因此，威妥瑪在 1854 年對佐麻須毫不客氣的批評，不見得對外交部產生極大的影響力。反過來說，外交部作為緊握帝國機器權柄之手，目的只在背後運用謀略及權柄，操縱一切，讓在華的威妥瑪以及在英國的佐麻須，同時參與設計及討論課程，通過他們的競爭，以此了解及掌握最全面、豐富及準確的資訊。作為帝國官僚的威妥瑪，以及一心想成為帝國官僚的佐麻須就需要極力表現自己，爭取表現，直到最後勝利。

到了 1860 年，競爭已見勝負結果。威妥瑪在華的地位日益鞏固，他經過二十多年的表現，個人以沉著的毅力努力證明自己各種能力（外交工作、改革課程、提升學員水平），證明自己的遠見及分析能力，終讓外交部改觀明白優質翻譯是中英外交工作之本，而日益獲得外交部的認同。另一方面，從 1854 年到 1860 年之間，由佐麻須在倫敦培訓出來的譯員，派到中國後，由於無法有效地讓外交部看到他們在倫敦受訓的好處，因此，外交部漸漸認為，與其在倫敦接受雜貨式的語文訓練，倒不如直接派學員到中國接受在職訓練。事實上，中國政局的發展，亦漸漸證明了威妥瑪的先見之明。1859 年天津條約後北京設領事前，英國深深體會到學員的價值，在於能跟中國官商朝廷溝通的北京官話。英國有感學生沒辦法從佐麻須那裡學得一口流利及純正的北方官話，就曾非常尖銳地批評過佐麻須，指他的官話只比學

<sup>19</sup> F.O. 228/224/125-140 [12 Mar 1857]; F.O. 228/233/39-45 [11 Mar 1857].

員好一點點而已，要他去教導及評核學員，可以說是極荒謬的事情(F.O. 228/ 299/ 1-10 [31 Dec 1860])。學員到中國後無法立即上任，外交部因而當時已想過，倒不如另聘兩名中國人在倫敦教導學員官話更好，以此減省費用。對於外交部的批評，佐麻須固然並不知道，他看到的只是課程改組後的結果。

外交部在 1860 年的統一招聘計畫的新實施方針，是通過公務員事務局頒布統一招生方法，在各間頂尖大學招收考生，課程只挑選出類拔萃的學生，而且絕不要學生懂得漢語，而即使學生已懂基本漢語基礎，亦絕不額外加分。佐麻須看到新政策之後，不單表現極度錯愕，而且甚為不滿。他認為這樣的機制對他極度不公平，原因是他過去盡心課程設計，5 年用心良苦把課程整理成教科書，無非是為了培養外交部譯員，而國王學院自 1854 年由克萊頓伯爵發起計畫以來，並在他的任內，已為外交部訓練了大概 20 位譯員並全部派遣到中國，他認為學生表現令人滿意。現在課程改革後不單沒有作出照顧國王學院的措施，而且更指漢語一科不會被列入考試範圍之內，這樣大大損害了他的利益，不單令他的身價大跌，他的教科書也無法一紙風行，他之前的努力都變得前功盡廢。佐麻須更指，德庇時曾經看過他的專著，並大力推荐，可以看到教科書本身甚具價值。另一方面，他指羅素爵士在 1859 年計畫重整課程的時候，曾表示會詢問他的意見，並答應會盡力參考。佐麻須立即趁著這個機會，要求外交部給予適當的補償，讓他加入外交部(F.O. 17 /363/ 305-307 [20 April 1861])。他認為，外交部可以聘請他成為中國譯員或者日本學生譯員，讓他發揮專長。他認為他的資歷及履歷絕對適合，有助國家發展。佐麻須在推銷自己的同時，並同時請得德庇時提交推薦信。德庇時的推薦信中指(F.O. 17/364/104-6 [15 May 1861])，佐麻須一直以來都希望投身外交部工作，並希望國家能考慮他的要求。

佐麻須於 1848 年到港，德庇時於同年擔任香港港督之職任期屆滿回英國，兩人是否在香港時已經認識，我們暫時不得而知。但是，佐麻須寓居香港的時候，曾經引發了一場外交風暴，恐怕所有曾在香港生活的英國人都曾經聽聞，事實上，我們可以甚至推斷整個澳門社會都認識他。這場小風波釀成英葡兩國及葡國澳門殖民政府爆發的外交衝突，不涉及他的漢語學習及教學，更不涉及他的傳教事業，但卻讓他加入外交部的夢想徹底落空。

1849 年 6 月 7 日，佐麻須休假時短暫到澳門旅遊，當他走到一條窄巷的時候，不幸遇上了天主教儀仗隊經過，由於這天是羅馬教廷的聖體日，儀仗隊要求所有路人人都要肅穆恭敬，甚至需要脫帽表示最基本的尊敬。由於佐麻須為新教基督徒，他堅決絕不除下帽子並表示不會跪下，儀仗隊認為這不單有褻瀆宗教之虞，而且身為英國人的佐麻須到葡萄牙管治的澳門卻公然挑戰本地宗教儀式，澳門葡萄牙總督認為他不尊重當地法律，於是把他收禁(F.O. 17/ 363/ 305 [20 -April -1861])。佐麻須被禁一天後，寫信到與他同船到澳門的美國領事及其他外籍人士求救，後來輾轉傳到了英國將軍加寶(Sir Henry Keppel ; 1809-1904)那裡，他認為必須拯救受難國人。於是派出英船到澳門要求放人，在拯救佐麻須的過程中，英國與澳門都有水手及軍人死傷。及後澳門葡萄牙總督正式向英國外交部交涉，要求賠償，英國在國會亦討論到國外在華生命保障的安排及治外法權的細節(Keppel 1899; 117-122)。

由此可以推測，威妥瑪及諾頓-崎畚對佐麻須的批評，可能是執著於漢學教授應有的基本漢語水平，但亦可能是由於更複雜的政治因素。威妥瑪來自軍人世家，自己來港時亦為上尉，對於佐麻須無端引起外交衝突不幸奪去英國軍人的性命，造成一死三傷的代價，殊感不值。另一方面，這事件最終釀成英國國會立法討論在香港居住的英國人於周邊地區的外交及法律等問題。雖然從側面看也可以是佐麻須的建樹，然而香港法律百慶待興，內部工作及與中國外交上的治外法權還未完全釐清，先討論澳門的治外法權不免令人覺得無甚必要。

外交部在考慮佐麻須的要求時，在文件空白處就留有不同討論的意見。有人指這名字非常熟悉，是不是就是於 1849 年引起外交衝突的人。有人斷然否認，直指國王學院的漢學教授，與此人同名而已。事實上，即使過了二十年，1861 年佐麻須寫信到外交部求職的時候，英國外交部內亦有人記得他曾引起外交衝突。在外交部曾處理佐麻須案件的職員，甚至能指出只要翻查寶咸港督的案件編號（Sir Bonham No. 91；January 1849）就能找出具體詳情，並以非常肯定的語氣指出，只要對比在華經歷，就知道這根本是同一人(F.O. 17/363/305 [20-April-1861])。

無論佐麻須的語文程度如何，以外交部這樣傲慢的部門(Otte 2011)，看來是無法接納他加入中國譯員計劃。因而，他們在回信內指出，無法招聘他成為中國外交部譯員，原因是所有合資格的申請者，都大概在 25 歲左右，因此並不適合。事實上，佐麻須在信中曾要求外交部考慮把他置於新開設的日本港口擔當譯員，當時日語人才嚴重匱乏，我們討論外交部的反應前，先討論佐麻須是在英國當時的一種怎樣的氛圍下學習日語及認識日本的。

### 陸、漢字圖的幻影

佐麻須上任國王學院成為漢學教授的 1853 年，其實亦是東亞政局風雲變色的一年。1853 年美國黑船突然到達江戶港，要求與日本通商擴大貿易利益。美國對日本虎視眈眈，固然反映著列強貪無厭止的野心，然而這亦是國際關係互相制衡的必然結局。美國以船堅炮利的方式恫嚇在東亞諸國力量僅次中國的日本，事實上是衝著英國在華利益而來。1844 年美國跟中國簽訂「中美望廈條約」時，開宗明義要「從英國壟斷者手中拯救中國」(“save the Chinese from the condition of being an exclusive monopoly in the hands of England”)(Fuess 1965: 407)，這首先已令當時的英國朝野極為震怒。1853 年派出黑船到達中國海對岸的一刻，英國正忙於急遽處理中國日益紛亂的局勢。1853 年 1 月，太平軍攻陷南京並定都於此改名為天京。眼前中國正受外交內亂煎熬，英國一方面希望藉太平軍消耗中國勢力，以享漁人之利，另一方面亦擔心內亂影響貿易額，及危害已在多個港口定居的國人的生命。因此，英國先發制人立即前往南京與太平軍會面，表示自己保持中立，向太平軍釋出善意，此舉亦有助恫嚇清廷，令清廷進退失據。不過，美國的偷襲卻有如螳螂搏蟬一樣，令整個東亞局勢產生前所未有的變數與波瀾(Hawks 1856)。

外交部漸漸意識到，只培訓中國學生譯員是不夠的，特別是處理局勢日趨複雜的日本。其實自 1849 年英國已經因英商及傳教士或在日本海域遇上擱淺或傳教衝突而向國會求救，當時在派出譯員的時候，已經遇到不少困難。而英國多次就貿易權、宗教以及軍事形勢討論是否需要在日本取得更多的外交協議時，考慮到日本

貿易額相對中國而言，本身並不算特別龐大，而且英國正忙於處理中國及歐亞間發生的克里米亞戰爭（Crimean War），因而認為應該統一戰爭資源，以免出現顧此失彼的情形。包令本來已經計畫到日本討論英日外貿及外交的措施，亦不得不擱置下來（Beasley 1951: 78-81）。直至美國在 1854 年 3 月簽訂《神奈川條約》（或日米和親條約）後，英國亦處理第二次鴉片戰爭等問題後，才派出額爾金（Lord Elgin; 1811-1863）到日本簽訂條約（F.O. 881/ 764X [19 July 1859]）。事實上，這一系列的事件，已令重新改組中國學生譯員計畫的包令已留心到英國不可以重蹈覆轍，在長期缺乏譯員的情形下，嚴重影響外交利益。他在 1854 年改革中國學生譯員計畫時，並在分配剛到達中國的學生譯員時，已留心到，只要若干學生表現良好，若他們能持續維持進度，很可能就需要在這基礎上學習日語，並分配到日本去。此外，英國亦要開始規劃培訓譯員學習暹羅語（即今天稱泰文：Siamese），交趾支那語（cochin Chinese；即後來統稱的越南語）以及高麗語（即韓文；corean languages）（F.O. 17/ 216/ 94 [22-Sept-1854]）。包令的計畫事實上極有遠見的，而外交部亦開始在這基礎上籌劃東亞各國的譯員計畫。可惜的是，在當時外交部對東亞的認識基礎、人力、資源等問題上，要兼及籌組其他地區的譯員計畫，實在是極捉襟見肘的。在這樣的情形下，因此而產生極大的錯誤。其中一個最致命的錯處，就是以為訓練日本譯員的最佳地方，是日本自唐宋起繼承文化淵源的中國，因而早期到日本的譯員都先被派到北京受訓，學習漢字。其中一位當時屬倫敦大學的學生，後來於 1861 年 8 月 20 日通過學生譯員計畫加入外交部，後更成為獨當一面的日本研究者，及著名外交官的薩道義（Sir Ernest Mason Satow; 1843—1929），在退休後才敢言直白地指這計畫的混淆開始，他雖無直接批評，卻反映了英國對東亞知識的無知。在他回憶外交生涯的重要著作《日本外交生涯》（*A Diplomat in Japan*）中他就指，與他同期到日本出任的其他學生譯員（Satow 1921: 18），都因為當時的某種流行想法（prevalence of a belief），大家需在北京學習然後才被派遣到日本。

佐麻須是不是分享著包令的遠見，看到學習日語能協助大英帝國發展東亞譯員計畫的好處，而在 1850 年間開始自學日語，我們暫時不得而知，他並沒有留下任何私人信件、書信及日記，我們無法推論他確實自學日語的一年。我們從現有的資料，只能看到於 1861 年他已自信自己的日語水平達流暢的程度，自覺足以此能力直接向外交部要求加入日本譯員課程擔當譯員。而在 1863 年，他就更以日語及中文知識，整合了之前在 1832 年起在廣州由傳教士群體（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 年）及衛三畏（Samuel W. Williams; 1812-1884）等編輯的《中國叢報》，加上日本歷史、文化、政治、地理等待包羅萬象的內容，擴充成為《中國（暨日本）叢報》，提供了既多元又豐富的中國及日本資訊，讓國內關心中日兩國發展的讀者，特別是外交部官員及國家政策制定者，特別留心。他在發刊詞及序論就聲言，冀望《中國（暨日本）叢報》成為歐洲及遠東（extreme Eastern world）更好交流的介面及工具（Summers 1863b: 1-12）。他能掌握時代的脈搏，除了是長期浸淫在中國及歐洲出版的中國學知識之中，另一重要原因是他能兼收並蓄，早於 1858 年 6 月 7 日，佐麻須向國王學院校長提出申請，要求讓他同時在大英博物館圖書館（British Museum Library）兼任助理，幫助圖書館整理目錄。他向校長指，自己已向大英博物館首席圖書館長（Sir Antonio Genesio Maria Panizzi; 1797-

1879) 申請了此職位。班里尼既是大英博物館首席圖書館長，亦是倫敦大學意大利語教授，他與佐麻須分屬同事。佐麻須在申請信指出，大英博物館所有的東方藏書，是聖彼德堡以外，收藏了歐洲最完善最及精湛的東方珍藏(Summers 1858.06.07)。佐麻須在大英博物館的工作，開了倫敦大學國王學院後繼者在博物館及圖書館兼任工作的先河 (Brown 1998: 122-129)，更統一了倫敦各種東亞資源的工作特色，我們可以推想，佐麻須在豐富的資源下，利用了歐洲學術界自十七世紀以來，累積深厚的日本研究 (Japanology) 的豐碩成果(Kornicki 1993a:502-524)，寓工作於個人追求知識上，繼續通過歐洲語言 (法、德、拉丁語) 自學日語。我們在同年大英博物館信託委員會於 1858 年 8 月 7 日會議紀錄中，證明博物館批准了佐麻須的申請，讓他出任中文目錄助理一職。不過大概一年後，他就提出請辭，信託委員會於 1859 年 3 月 19 日批准他的辭職申請。他服務的時間雖然短暫，但是，佐麻須不單可以接觸更多珍貴藏書，這亦有助他後來進一步在倫敦其他知識平臺的重要發展 (Wiegand & Davis 1994; 87-88)，這部分在下一節會繼續討論。

另一方面，佐麻須身處的倫敦大學一早就占有先機，首先感受到日本開港後，英國本土吹來了一陣新的東瀛風氣。最早一批江戶時代到英國留學的日本學生，就是到倫敦大學留學。日本幕末受到列強恫嚇後，看到清朝中國一再被迫與列強簽下喪權辱國的條約，已經醒覺學習西方現代化知識的重要性。日本更明白的是，學習西學，不再以通過轉折的軌道而來，而「西學」的內涵，更非只有 17 世紀已經傳入日本的「蘭學」。雖然還未到大政奉還天皇的明治時期，日本幕府以及占據各地的藩主，都似乎已經看到，直接學習西方現代化的知識，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直接派學生到西方留學。其實，早於 1857 年日本已經有一些認同西學之士，向幕府建議派員到西方學習，然而因為核心統治者幕府與日本各藩主對統一國內勢力共同「攘夷」有不同看法，這些計畫都因被迫胎死腹中。直到 1864 年英國與日本南面強藩薩摩藩因為「生麥事件 (1862 年)」開戰 (又稱薩英戰爭) 後，雙方傷亡慘重，最後不得不議和(宮澤 1987; Denney 2011)<sup>20</sup>。議和後，薩摩藩內先進之輩藉著英國商人及軍人的幫助，分別派出學生到英法留學，學習西方的軍事科技之長。1865 年到英國留學的學生，首批就到了倫敦大學大學院學習(Cobbing 2000)。1866 年，幕府為了箝制南方強藩主動學習西學帶來的壓力，又通過當時的駐日本英國領事夏巴禮 (Sir Harry Parkes; 1828-1885) 的幫忙，派出另一批年輕人到英國留學，夏巴禮考慮到倫敦大學在入學條件及宗教上的要求最為寬鬆，於是推薦他們到倫敦求學 (Koyama 2004; 1-12)。事實上，後來，其中一位跟隨年輕皇子東伏見宮依仁親王 (1867-1922) 到英國留學的長州藩士隨員南貞助(1847-1915)，到了英國後通過日本學生找到佐麻須，並與他在家共同出版海外第一份以日語出版的日本報刊《大西新報》。如我們認真地細讀大西新報的各種資料，甚至對比印度辦公室出入書信的內容，我們更會驚訝地發現，《大西新報》出版的地點其實就是他的家 (3, George Yard, Lombard Street) (MSS EUR F303/48)，亦即是說，為了推廣倫敦市場上一紙

<sup>20</sup>「生麥事件」是指 1862 年 9 月 14 日發生日本的英日衝突。1862 年 9 月 14 日，四名英國人在生麥村 (現橫濱市鶴見區) 遇上從幕府回來的薩摩藩藩主以及他的 700 人儀仗隊。按照慣例，平民需要向儀仗隊下跪及退讓，可是四名英國人並無下跪，其間，其中一名英國人的馬突然受驚衝入儀仗隊，儀仗隊衛士立刻拔刀，在混亂間砍死了英國人。英國與薩摩藩因此而爆發戰爭。英國及日本學界對此衝突研究甚多，在此不能詳細列出所有參考書。簡單列出數項如下(宮澤 1987); (Denney 2011)。

難求的日本印刷品，他甚至自置印刷機推動日語雜誌的出版。這樣看來，他的貢獻就不只是現時研究者看到的他作編輯的角色而已(蛭原 1936: 43-48)。《大西新報》雖然只出版了一期，然而在英日兩地的文化史上有重要的開拓意義。

此外，即使他在生活最困頓的晚年，不單繼續在日本推動以英語作為拼音工具，整理日本北面阿以奴語(Ainu)字典，更自資出版各種幫助外國人學習日語成語「熟語」的學習工具及教材。這樣看來，他推動文化的工作，就不純粹帶有功利目的了。

我們雖然無法證明從 1854 年到 1860 年間，佐麻須在哪一年開始學習日語，他的程度又如何。然而學界現在有一說法，認為英國外交部早年設立日本譯員計畫初期，由於受到佐麻須誤導，因而把日本學員置於北京學習，浪費了寶貴的培訓時間，令國家蒙受不必要的損失(Twitchett 1862: 6-7)。

但是，佐麻須有沒有辦法對外交部產生這樣大的影響力呢？從上一節我們已看到，佐麻須以多年漢學教授的身份向外交部建議漢語課程的種種安排，外交部也從不會全盤接納，有些時候甚至會毫不留情面地批評。在這樣的情形下，他如何有能力對剛剛建立的日本譯員計畫，產生巨大的影響力呢？此外，還有幾點值得商榷的地方如下：第一，從現有外交部的檔案中，暫未找到佐麻須向外交部建議日本譯員計畫的學員先在北京受訓的文件。現在可以看到佐麻須曾經提到相關的意見的，只是 1861 年 1 月 29 日佐麻須寫信到外交部要求外交部捐助以斯當東命名的獎學金時，他指出學習漢語的重要性時候，提到這對學習日語的好處。他明言，中日對於英國而已都是東亞極重要的貿易區域，譯員要表現出色及稱職，良好的語言能力是必須的，而能先在本國先接受訓練極其重要。而且，他認為日語與中國語有緊密的聯繫，譯員先學中文，可以令他們學習日語事半功倍(F.O. 17/ 362/ 223 [29 January 1861])。然而這種意見，就像薩道義所言，是普遍流行的看法。佐麻須指出與否，學習日語的過程因有漢字作為基礎，這的確是事半功倍。但是否因此而需先到北京學習漢語再學習日語，這大概絕對不同的事情。第二，一個更有力的證據就是，外交部在停止再派學員到北京學習日語的文件中，從來沒有指出佐麻須需要對此負責任。而討論這點的時候，我們需要先理解日本學生譯員在北京終止受訓說起。

1863 年 1 月，當時的漢文正使(Chinese Secretary)威妥瑪寫信回英國外交部，指他收到正在日本處理「生麥事件」議和條文的尼爾將軍(Edward St. John Neale; 1812-1866)的幾封公文。時在北京擔當威妥瑪下屬副漢文正使的米憐(William Charles Milne; 1815-1863)，在檢視尼爾的日本原信時，發現中國漢字間有一些不能辨明的符號穿插，雖然文字秀麗，然而無法深入盡得文內的上文下理，尼爾一信雖附有英文譯文，但兩者相拼合璧，不能參透其義。米憐於是召集幾名中國秀才及舉人，一起解讀該日本公文。然而無論各人如何努力，均只能認得幾個漢字，而且更指信內的漢字與中國的漢字風格亦截然而同，各人一籌莫展。於是，時在中國的漢文正副使便醒覺，在北京訓練日本學生譯員不單荒謬，而且是浪費資源。於是，他們立即把已身在北京隸屬日本學生譯員計畫的學子，立即派遣到江戶(F.O. 228/356/ 31-37 [28- 10- 1862]; Satow 1921: 18)<sup>21</sup>。

<sup>21</sup> F.O. 228/356/ 31-37 [28- 10- 1862]; 另，薩道義的回憶錄中對此有記述，但由於他當時屬學生身份，根本不知道事情原委。因此，現以薩道義的回憶錄對讀外交部檔案，即能從裡到外見英國從北京撤

如果說，佐麻須是向外交部獻計，置放日本學生譯員計劃到北京受訓的人物。那麼，在 1863 年駐中國的威妥瑪發現這個重大歷史錯誤時，他一定會在信內大肆批評佐麻須，就像之前於 1857 年在檢討中國學生譯員計劃的安排時，他感言批評佐麻須中文水平不濟，課程設計不周一樣(F.O. 228/224/125-140 [12 Mar 1857]; F.O. 228/233/39-45 [11 Mar 1857].)，而絕不像現在般，隻字不提到底這是誰的主意，令外交部又產生另一重大「翻譯醜聞」而浪費極多人力。事實上，英國國會後來因應不同原因，檢討外交部派學生譯員到日本時，我們都看到，在這些文件中不單沒有指出佐麻須是計畫的始作俑者，更重要的是反映出，直到多年之後，英國如何在本土教導日語，其實還沒有什麼明確的方針，混亂不堪。

在 1860 年之前，公務員事務局 (Civil Service Commission) 成立之際，並統一全國招聘所有譯員時，文件就指，看到招考中國學生譯員與日本譯員的試題完全一樣。我們大概可以了解，在這個時候這種東亞語言誤識其實已經形成(House of Commons 1861)。另一次就是二十世紀初的 1909 年，英國重組在倫敦幾所教導東方語言的大學及課程時，英國國會成立調查委員會了解倫敦學習東方語的成效及問題的過程中，而促成成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奠基國會文件雷爾報告 (Reay Report) (Great Britain 1909: 74)。在報告內，再請當時曾參與中國及日本學生譯員計劃等前外交官員出席會議，檢討之前倫敦大學及外交部合作的種種安排時，當中沒有任何證據證明佐麻須與此有直接關係。

### 柒、東亞知識的廣泛生產及普及

佐麻須好像在學歷及履歷上都不能跟威妥瑪相提並論，不得不黯然退出外交及政治舞台。然而實情是，他繼續利用國王學院處於國內政治中心及國際文教樞紐的位置，在一個更自由及廣闊的世界，產生更多樣化的東亞知識。佐麻須在這樣的平臺發揮的影響力，與外交部狹窄、向心式、精英制傳播知識的渠道完全不同。他利用帝國機器的另一平臺——倫敦印度辦公室圖書館，再結合倫敦作為世界資訊中心及新湧現的現代媒體的力量，產生出更廣泛更全面的東亞知識。

其中最具突破性的發展，是他於 1868 年起成為倫敦印度辦公室圖書館 (India Office Library) 專門負責整理中文書目及手稿的助理。倫敦的印度辦公室(前身為 India House)圖書館成立於 1798 年，隸屬東印度公司，位於倫敦 Leadenhall street。1858 年印度爆發反英暴動，及後東印度公司經營權正式結束，英國政治架構中重新檢討英屬印度管治的所有事宜，成立英國皇家殖民地部，由專責印度事務外相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 管理。之前藏於印度辦公室圖書館及博物館內的書籍、手稿以及各收藏品，亦同時隨著這契機重新整理，並搬遷到座落於 Whitehall 的新辦公室中(Datta 1966:99-148)。倫敦印度辦公室圖書館 1868 年會議紀錄指，館長何爾 (Fitzedward Hall; 1825-1901) 聘請佐麻須擔任編輯圖書館書目的建議書已經落實，並會日內通知佐麻須，月薪 50 英鎊(India Office Records IOR/ MSS/ EUR/ F303/ 47 [Library Minutes Reference Memorandum; March 1865 to Dec 1868])。我們無法在印度辦公室圖書館找到原來何爾的建議書。但是，從圖書館的會議紀錄中可

---

走日本譯員的原委。見(Satow 1921.18)。

以看到，何爾一早就認識佐麻須，而且定出建議書前一心已認定他是最理想的人選，指望他能幫忙處理圖書館內積存已久的中文印刷出版刊物、圖書及手稿。何爾是著名東方學學者，特別是對梵語及印度坦斯語學有深刻的研究。他在 1862 年起在國王學院擔任教授，亦即是說，他與佐麻須同為國王學院的同事，兩人在校內或其他學術平臺可能一早已有了合作。何爾同年成為印度辦公室圖書館館長，在任期間帶來多種建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整理了堆積如山又從未編目的珍貴書籍及手稿。印度辦公室圖書館並不是公共圖書館，雖然積累了極珍貴及多樣化的典籍，而且與本土及世界各著名圖書館及學術機構有固定的聯繫，形成一個巨大的知識網路，並會主動大量訂購最新出版與東方（主要是印度及中亞一帶）有關的學術書籍，然而服務對象卻並不是以學界及一般市民為主，而是大英帝國的官員，為他們了解及籌備新施政時能找到相關知識作參考之用。此外，從海外歸國的帝國官員亦會搜羅大量東方珍貴手稿、藏典、文物及出版物等等，這些珍藏都會歸入相關的部門，倫敦印度辦公室圖書館就是其中一個重要的館藏之處(Arberry 1967)。能加入印度辦公室圖書館，就好像被帶到一個廣袤無阻礙的知識世界。佐麻須雖然對於印度辦公室圖書館的工作，只屬合約或顧問性質，但是他就能以一貫的在這些平臺，取得多種學習及圖書資源滿足自己需要。佐麻須的工作，本來只需要編輯漢語目錄，不過，由於他通曉日語，漸漸他的編目工作範圍就擴大到中日語，以及後來滿州語及西藏語(IOR/ MSS/ EUR/ F303/ 48/ 296 [24 June 1869])，而後來編成了 1872 年出版的《印度辦公室圖書館中日滿語書目概述》*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Japanese, and Manchu Books In The Library of The India Office* (Summers 1872)。他同時具備中日語知識，雖然沒有讓他獲得外交部特別垂青，但是，這卻是當時倫敦不可多得的專才，讓他成為獨當一面的東亞知識專家。倫敦藏書家需要找人協助購買中日書籍時，由於他能集合學界以及豐富圖書館資源，人脈以及在地資源，他成為在倫敦知識界中不可多得的人材(Kornicki 1993b: 209-300)。

不過，對佐麻須而言，能夠在印度辦公室圖書館工作，最大的收穫似乎是能借用深邃無涯的藏書，遨遊學問世界及出入於各種知識網路，而實踐他更多的出版計畫。從印度辦公室圖書館的會議紀錄及日誌(*Daybook*)可見，他自從加入印度辦公室圖書館後，不單可以常常利用圖書館豐富的資源，借得整個英國及歐洲都難能可見的重要圖書作參考(IOR/ MSS EUR/ F303/ 10 [2-July-1869])，他更會定時捐贈自己的出版物，確保自己的學術及出版工作不致湮滅。而更重要的是，他可以作多種買書的建議，方便自己處理書商、學界以及各種貫穿各種公共學術網路平臺的工作。這些方便，單是國王學院這個學術機構事實上是不能提供給他的。

但圖書館更實際提供給他的，是 1869 年起他與新館長萊河(Reinhold Rost; 1822-1896)合作一起編輯東亞學術雜誌《鳳凰》(Phoenix)的機會。《鳳凰》的編輯方向建基自專門報導亞洲各種政治、文化、歷史等多方面的綜合資訊。《鳳凰》的主要讀者群比《中國(暨日本)叢報》的圈子更大，包含更多亞洲的資訊，這些亞洲的資訊，從印度辦公室圖書館各種新鮮及即時搜購回來的資訊中提取出來，當中亦有翻譯自歐洲學者的著作，資訊及題材包羅萬象。《鳳凰》及《中國(暨日本)叢報》在當時而言，是極為重要的東亞資訊的文化陣地。當中雖然不少文章份量十足，但雜誌編輯方向以短小精悍為主，把長篇文章分章刊出，目的就是普及化這些

讀物並吸引讀者長期訂閱。固然這樣的用心，並不是當時每位讀者都能明白 (Anonymous 1872:83)，而雜誌的執筆者，不少是到亞洲擔任翻譯及外交工作的官員，單就日本專家而言，如雷貫耳的日本專家薩道義、阿斯顿 (William George Aston; 1841-1911)、狄其斯 (Frederick Victor Dickins; 1838-1915) 等等均會定期賜稿。他們願意響應佐麻須的號召投稿到他主編的雜誌上，反映著他們對這些雜誌的認同，以及明白到在倫敦及東亞讀者市場上的需要，更明白到作為譯員及官員，他們所認識的東亞，比英國國內誰人都更清楚更準確，積極投稿，不單增加個人在社會層面的影響力，更能產生輿論壓力，結合各東亞專家的聲音，反過來影響英國國會制定東亞政經方案，甚至推動了大學學府內日本語言講席及日本研究的出現 (Lynass 2002)。雖然後來當日本學 (Japanology) 在英國發展越來越成熟的時候，佐麻須的日語知識及相關編輯工作，漸漸被時代唾棄，被這些專家批評為「不切實際」(Satow & Ruxton 2008: 148)，但是，如果我們能從一個比較寬闊的角度去審視他的貢獻，他的編輯工作，無論動機是否是要討好外交部，還是只是純粹為了在英國推動研究東亞氣氛及傳播東亞知識，他龐大的動員能力以及投入其中的心血及精力等，是在沒有國家資源資助下完成，而達至這驕人的成果。另外一點不容忽視的是，他把大量的東亞資訊，傳播到官僚階層及菁精階層以外的國民，普及化了大量的東亞資訊及文化，有助提供一個更貼切更真實的東亞圖像 (Yokoyama 1982)，因此他的貢獻不容簡單一兩句就全盤否定及忽視，他加入外交部的野心以及挫折，亦不應該成為阻止我們對他有更公平評價的因素。

佐麻須在 1873 年獲得岩倉使團的團長邀請 (佐々木 1975: 78)，毅然離開了他任教二十年的國王學院。他的離職，是在沒有經國王學院同意下而擅自離開的。他要求學院讓他休假 2 年，讓他出任日本大學的英語教授，但學校無法在當時的環境同意這樣的安排。佐麻須最終在沒有正式辭職下貿然離開了國王學院。學院內部會議決定立即終止他的職位，並同時招聘國王學院第三任漢學教授 (Cunningham 1873.07.23)。然而，佐麻須帶著離開的，卻是豐富的東亞知識，人際網絡以及各種經營公眾知識平臺的經驗。到日本後，他除了繼續投身教育事業，擔當大學教授講解英語、英國文學及漢學，編輯大量教材及講義，如《新式日英會話 (Up-to-date English and Japanese conversations (Summers 1908))》、《英語對話演習書 (English Dialogues For Practice on Reading the English Language (Summers & 稻垣明治 21))》、《English Outline Vocabulary for the Use of Students of the : Chinese, Japanese, and other languages arranged by John Bellows With notes on Writing Chinese with Roman Letters (Bellows & Summers 1868) 》等以及多種新湧現的日本資訊雜誌及報刊 (如 *Japan Mail*)，活躍於學界及文化界，並繼續以各種研究學會成員及秘書身份 (如 *Tra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 推動中英日三國各類學術翻譯及研究，甚至編輯阿伊努語字典 (Summers 1886: 186-232)，發掘及拯救東亞的邊緣聲音，他的一生以自己作為中英日三國的橋樑，並以普及及文教知識聯繫了本來被階級所分化的社會，實現了知識改變命運的箴言。

## 捌、結論

在過去的漢學研究裡，國王大學第二任漢學教授佐麻須在中英兩國的事跡，往往因為大量研究資料散落於不同檔案館，而令人難以對他有一個比較全面的認識。本文從各種原始資料入手，並重新置他於時代脈絡中分析這些資料，目的是讓漢學研究能從不同的角度了解他的貢獻。本文的另一要旨，也在於指出東亞知識的生產，在十九世紀中葉起，除了是通過大量外交部譯員親身在東亞各國見證、收集及紀錄之外，也在於更廣闊的出版、印刷及圖書界這些物質文化的文化平臺上積累著。佐麻須的個案值得研究的地方，是他帶動了不同地域、語言及不同知識板塊，建構出另一種帝國生產東亞知識的圖像。

## 參考文獻

- 《日本大百科全書》(1994)，東京：小学館，vol.10，「サマーズ」一條。
- 丸山眞男、松沢弘陽(2001)編，福沢諭吉の哲学，東京：岩波書店。
- 中川かず子“ジェームズ・サマーズ”(2008)，日本研究者、教育者としての再評価  
北海学園大学人文論集，41，頁 95-122。
- 手塚竜磨(1968)，東京府史料にみるサンマー學校，英學史の周辺，東京：吾妻書房，頁 174-93。
- 平勢隆郎(2007)，有關漢字圈的成立，甘懷真《東亞歷史上的天下與中國概念》，臺灣：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頁 53-82。
- 佐々木満子(1975)，J. サマーズ，英學の黎明，東京：近代文化研究所(昭和女子大學內)，頁 73-102。
- 佐野真由子(2003)，オールコックの江戸：初代英国公使が見た幕末日本，東京：中央公論新社。
- 村田雄二郎；C・ラマール(Christine Lamarre)編(2005)，漢字圏の近代：ことばと国家，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 谷崎潤一郎(1966-1970)，秋香塾とサンマー——，谷崎潤一郎全集・幼少時代，第 17 卷，東京：中央公論社，頁 231-240。
- 昭和女子大学近代文学研究室(1956)，近代文學研究叢書：J. サマーズ，第 2 卷，東京：光葉会，1956.1-2001.5，頁 18-59。由於 Lily Summers 後來生活極潦倒，因此她的訪問內容不能避免出現傾向誇大佐麻須出身的情形。
- 重久篤太郎(1932)，日本に於ける沙翁研究の先驅としてのジェームズ・サマーズ，書物展望，東京：書物展望社，(Nov) 2(11) [51]，頁 8-14。
- 宮澤眞一(1987)，薩摩とイギリスの出合い：生麦事件，鹿児島：高城書房出版。
- 庭野吉弘(2008)，日本英学史叙説：英語の受容から教育へ，東京：研究社，頁 67-80。
- 蛭原八郎(1936)，大西新聞，海外邦字新聞雜誌史，東京：學而書院，頁 43- 48。
- 溝口雄三(1992)，漢字文化圏の歴史と未來，東京：大修館書店。
- 濱下武志(1997)，朝貢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東京：岩波書店。
- 關詩珮(2011)，英國倫敦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 London)首任漢學教授費倫

- (Samuel Turner Fearon)——兼論斯當東 (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 贊助人的角色, *印刷出版與知識環流：十六世紀以後的東亞*,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頁 123-154。
- 關詩珮(2012), 翻譯與殖民管治：早期香港史上的雙面譯者高和爾 Daniel Richard Caldwell (1816-1875), *現代中文文學學報*, 第 10 卷, 頁 174-194。
- 關詩珮(2013), 英法《南京條約》譯戰與英國漢學的成立——“英國漢學之父”斯當東的貢獻, *翻譯史研究*, 第 3 期, 頁 128-164。
- 關詩珮(2013), 翻譯政治及漢學知識的生產：威妥瑪與英國外交部的中國學生譯員計畫(1843-1870),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Vol.81 (9), 頁 1-51。
- 關詩珮(2014.9), 全人教育之爭？香港聖保羅書院與翻譯課程(1840s-60s), *翻譯史研究*, 第 4 期 (即將出版)。
- Anonymous (1872.02.01), “Review” *North China Herald*, p. 83.
- Apter, David Ernest (1987) *Rethinking Development. Modernization, Dependency, and Postmodern Politics*, (London Newbury Park ; London : Sage.
- Arberry A. J.(1967) *The India Office Library : A Historical Sketch*. London: Commonwealth Office.
- Beasley, William G. (1951) *Great Britain and the Opening of Japan, 1834-1858*. London: Luzac.
- Bellows, John; Summers, James (1868) *English Outline Vocabulary for the Use of Students of the Chinese, Japanese, and Other Languages*. London: Trübner.
- Breckenridge, Carol Appadurai; van der Veer, Peter (1993) Ed. *Orientalism and the Postcolonial Predicament Perspectives on South Asia*.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Brock, Michael. Curthoys, Mark. (1984) *The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Vol. VI, VI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Brown, Yu Ying. (1998) 'Sir Robert Kennaway Douglas and His Contemporaries', *Electronic British Library Journal*] p. 122-129, <http://www.bl.uk/eblj/1998articles/article8.html> (accessed 31 Feb 2011)
- Cobbing, Andrew (2000) *The Satsuma Students in Britain: Japan's Early Search for 'The Essence of the West*. Richmond, Surrey: Japan Library.
- Cohn, Bernard S. (1996) *Colonialism and its Forms of Knowledge : the British in Indi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ooper, Frederick. Stoler, Anne Laura (1997) (Ed.), *Tensions of Empire: Colonial Cultures in a Bourgeois World*.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otazzi, Hugh (2004) *British Envoys in Japan 1859-1972*. Folkestone, Kent: Global Oriental.
- Cox, Michael. Dunne, Tim, Booth, Ken. Ed. (2001) *Empires, Systems and States: Great Transformation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Cunningham, J W (1852.12.11) Unpublished Manuscript (KA/OLB3-4/ 227) King's College London Archive
- Cunningham, J W (1853.3.3) Unpublished Manuscript. (KCL/ OLB/3-4/ 262)King's College London Archive.
- Cunningham, J.W. (1873.07.23) Unpublished Manuscript. KCL/OLB/ 5-6/ 107 Kings College London Archive.

- Cunningham, J.W.(1853.03.04) Unpublished Manuscript. KCL/ OLB/3-4/263. Kings College London Archive.
- Datta, *Rajeshwari* (1966)“The India Office Library: Its History, Resources and Functions” in *The Library Quarterly*, volume 36, April 1966, number 2. pp. 99-148
- Davis, John. F. (1865) *Chinese Miscellanies: A Collection of Essays and Notes*. London: John Murray.
- Denney, John (2011) *Respect and Consideration: Britain in Japan 1853 - 1868 and Beyond*. (Leicester: Radiance Press.
- Eisenstadt, S. N. (1963) *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Empires*. London: Free Press of Glencoe.
- F.O. 17/ 162/ 191 -228[6- Sept- 1849] ; F.O. 17 /183/ 271[28-March-1851]
- F.O. 17 / 362/ 273 [13February 1861]
- F.O. 17 /363/ 305-307 [20 April 1861]
- F.O. 17/ 135/ 10 [12-April- 1847]
- F.O. 17/ 216/ 94 [22-Sept-1854]
- F.O. 17/ 362/ 223 [29 January 1861]
- F.O. 17/ 362/ 223[ 29-January-1861]
- F.O. 17/ 362/ 53 [5-January-1861]
- F.O. 17/ 363/ 241[April1861]
- F.O. 17/ 363/ 305 [20 -April -1861].
- F.O. 17/216/335 [9 Oct 1854].
- F.O. 17/217/323-324 [29 -Nov -1854]
- F.O. 17/217/323-324 [29-Nov- 1854]
- F.O. 17/307.
- F.O. 17/351/120 [15 Mar 1861].
- F.O. 17/364/104-6 [15 May 1861]
- F.O. 228/ 299/ 1-10 [31 Dec 1860]
- F.O. 228/224/125-140 [12 Mar 1857]
- F.O. 228/224/125-140 [12 Mar 1857]; F.O. 228/233/39-45 [11 Mar 1857].
- F.O. 228/232/148-151 [1857 June 9]; F.O. 228/250 [1858 June 25].
- F.O. 228/233/39-45 [11 Mar 1857].
- F.O. 228/356/ 31-37 [28- 10- 1862]
- F.O. 881/ 764X [19 July 1859].
- Foster, Joseph (1887-1888) *Alumni Oxonienses 1715 and 1886*, vol. 4 . Oxford : Parker and Co..
- Fuess, Claude M (1965). *Life of Caleb Cushing*. Hamden : Archon Books, 1965. Vol.I.
- Great Britain (1909).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Appointed by the Lords Commissioners of His Majesty's Treasury to Consider the Organization of Oriental Studies in London*, (cmd. 4560) London: H.M. Stationery Office. Minutes of Evidence , no. 2054, 2057, evidence of Sir Ernest Satow, p. 74.
- 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 *Further Correspondence Relative to the Earl of Elgin's Special Missions to China and Japan 1857-1859*.( London: Printed by Harrison and Sons.)
- Gützlaff, Charles. (1841) Letter from the Rev. Charles Gützlaff to John Vaughan, Esq., on the Chinese System of Writing,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 Volume 7, Issue 1, pp. 7-9.
- Hart, Jennifer. (1972) "The genesis of the Northcote-Trevelyan Report." *Studies in the Growth of Nineteenth-century Government*, ed. Gillian Sutherland.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 Hawks, Francis. (1856)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 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52, 1853 and 1854 under the Command of Commodore M.C. Perry*. (United States Navy, Washington: A.O.P. Nicholson by order of Congress.
- Hong Kong Public Records Office (HKPROF), Carl T. Smith · CS/1015/00145539, CS/1015/00145547, CS/1015/00145549 ◦
- House of Commons.(1861) *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Diplomatic Service; Together with the Proceedings of the Committee, Minutes of Evidence, Appendix, and Index* (No.2959) London: H.M. Stationery Office.
- India Office Records IOR/ MSS/ EUR/ F303/ 47 [Library Minutes Reference Memorandum; March 1865 to Dec 1868]  
IOR/ MSS EUR/ F303/ 10 [2-July-1869]  
IOR/ MSS/ EUR /F303/ 48 /296 [24 June 1869]
- John. F. Davis, *Chinese Miscellanies: A Collection of Essays and Notes*, p. 90
- Jones. Raymond A. *The British Diplomatic Service 1815- 1914*, (Gerrards Cross : Smythe, 1983), p.15; 142-143.
- Kang, David Chan-oong (2010). *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 Five Centuries of Trade and Tribute*.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Keppel, Sir Henry (1899). *A Sailor's Life Under Four Sovereigns*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 Kidd, Samuel (1838) *Lecture on the Nature and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London: Taylor & Walton.
- Kidd, Samuel (1841) *China: Or, Illustrations of The Symbols, Philosophy, Antiquities, Customs, Superstitions, Laws, Government, Education, and Literature of The Chinese: Derived From Original Sources, And Accompanied With Drawings From Native Works*. London: Taylor & Walton.
- Kornicki, P. F. (1993b) "The Japanese Collection in the Bibliotheca Lindesiana", in *Bulletin of the John Rylands Library*, 1993;75(2):209-300.
- Kornicki, P. F. (1993a) "European Japanology at the End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Vol. 56, No. 3 (1993), pp. 502-524.
- Koyama, Noboru (2004) *Japanese Students at Cambridge University in the Meiji Era, 1868-1912*. Morrisville, N.C.: Lulu.
- Koyama, Noboru.(1997) "James Summers, 1828-91: Early Sinologist and Pioneer of Japanese Newspapers in London and English Literature in Japan," in *Britain & Japan Biographical Portraits*, ed. Ian Nish. Folkestone : Japan Library.
- Kwan, Uganda Sze Pui (2013) "A Requisite of Such Vital Importance: 'The Want of Chinese Interpreters in the First Anglo Chinese War 1839-1842,'" in Lawrence Wang Chi Wong, ed., *Towards a History of Translating: In Celebration of the For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Research Centre for Translation* (Hong Kong: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Transl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p. 389-417.

- Kwan, Uganda Sze Pui. (2014)“Translation and the British Colonial Mission: The Career of Samuel Turner Fear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Studies in King’s College London,” *Journal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3), pp.1-20.
- Matthew, H.C.G. Harrison, Brian. Lawrence Goldman, eds (2004).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Volume 53, ‘James Summers’, pp.318-319.
-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1846). *The Eighth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Annual Report*. (Hong Kong: Office of the China Mail).
-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1847) . *The Ninth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Annual Report*.(Hong Kong: Office of the China Mail).
- Moncrieff, E.T. R. (1850.6.8) Unpublished manuscript (CMS/ C/ CH/ 063/2)及 CMS/ CCH/ 063/ 3A.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Archive.
- Norton Kyshe, James William (1971). *The History of the Laws and Courts of Hong Kong from the Earliest Period to 1898* Hong Kong : Vetch and Lee , pp.348.
- Otte, Thomas G (2011). *The Foreign Office Mind: The Making Of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865-1914*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Oxford University Archive. 'Registers of examinations leading to the degree of Bachelor of Arts' , James Summers Register for Candidates taking *Responsions* . (UR 3/1/3/1).
- Satow, Sir Ernest Mason. (1921) *A Diplomat in Japan*, (Philadelphia: Seeley, Service), p.18.
- Satow, Sir Ernest Mason. Ruxton, Ian (2008) ed and transcribed, *Sir Ernest Satow's Private Letters to W.G. Aston and F.V. Dickins: The correspondence of a Pioneer Japanologist from 1870 to 1918* (London: Lulu).
- Smith, Carl T. (2005). *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and the Moulding of its Students Chinese Christians : Elites, Middlemen, 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 (Hong Kong :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new edition).
- Smith, George (1850.04.5) Unpublished manuscript (CMS/ C/ CH/ 063/1)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Archive.
- Stanton, Vincent. (1852.11.25) Unpublished manuscript. (KA/IC/S50) King’s College London Archive.
- Staunton, George (1852.12.3) Unpublished manuscript.(KA/IC/S50) King’s College London Archive.
- Summers & 稻垣才三郎(1888) *English Dialogues For Practice on Reading the English Language* 英語對話演習書，日本外國語學校出版。
- Summers, James (1852.11.22) Unpublished manuscript.(KA/IC/S50) King’s College London Archive.
- Summers, James (1852.11.24) Unpublished manuscript.(KA/IC/S50) King’s College London Archive.
- Summers, James (1853b). *The Gospel of Saint John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According to the Dialect of Shanghai, Expressed in the Roman Alphabetic Character with an Explanatory Introduction and Vocabulary*, London W. M. Watts.
- Summers, James (1858.06.07) Unpublished manuscript (KA/IC/S61) King’s College London Archive.

- Summers, James (1863a) *A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Parts I and II, Grammar and Chrestomathy, Prepared with A View To Initiate The Student or Chinese in the Rudiments Or This Language, and to Supply Materials for his Early Stud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 Summers, James (1863b) “Preface” and “Introductory Essay on the Scope and Objects of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Repository,”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Repository* Vol. 1. London: W.H. Allen and Co., pp.1-12.
- Summers, James (1864).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Repository, Facts and Events in Science, History and Art, relating to Eastern Asia*, Vol. II (London: Chinese and Japanese Repository), p. 27.
- Summers, James (1872)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Japanese, And Manchu Books In The Library Of The India Office*, Printed by order of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 in Council.
- Summers, James (1886) *An Aino-English vocabulary*. Yokohama :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 p. 186-232.
- Summers, James. (1853a) *Lecture on the Chinese Literature and Literature* (London: John W Parker and son, West Strand).
- Summers, Lily (1951) ‘Impressions of Japan in 1873 : Told by Old Foreign Resident’, *Nippon Times*, 11,18, 25 June.
- The Athenaeum : Journal of English and Foreign Literature, Science, and the Fine Arts*, London Saturday, January 22. No. 1317.
- The Calendar of King’s College London for 1854-1855 (London: John W. Parker, West Strand, 1854), pp. 35-44.
- Twitchett , Dennis (1862). *Land Tenure and the Social Order in T'ang and Sung China*(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pp. 6-7.
- Unforgettable people to Japan. <http://www2s.biglobe.ne.jp/~matu-emk/summers.html>  
( 檢索日期 2013.11.30 )
- Wiegand, Wayne A. ; Davis Donald G. (1994) . *Encyclopedia of Library History*. New York: Garland. pp. 87-88.
-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James\\_Summers](http://en.wikipedia.org/wiki/James_Summers) ( 檢索日期 2013.11.30 )。
- Womack, Brantly. (2006) *China and Vietnam: The Politics of Asymmet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Yokoyama, Toshio (1982) *Japan in the Victorian Mind: A Study of Stereotyped Images of a Nation 1850-1880* Oxford: University of Oxford.